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新媒體社運行動者的主體性探討－

以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為例

The Subjectivity of Social Actors of New Media Social
Movement- the case of Anti-Black Box Curriculum

王怡蓁

Yi-Chen W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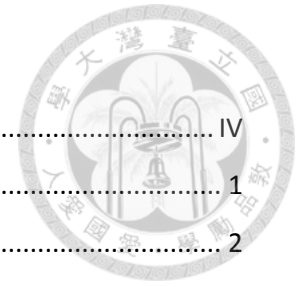
指導教授：張錦華 博士

Advisor: Chin-hwa Chang, Ph.D.

2017年2月

February 2017

目錄



謝誌.....	IV
摘要.....	1
第壹章、 研究目的.....	2
第貳章、 反黑箱課綱運動背景介紹.....	3
第參章、 文獻回顧.....	7
一、 Touraine 的行動者主體轉化.....	8
二、 Foucault 的倫理主體.....	9
三、 個人主體到社群主體.....	12
四、 社群主體到歷史主體.....	15
五、 與主體相關的研究文獻.....	16
六、 新媒體社運與主體性.....	19
1. 社會性運動的定義.....	19
2. 新媒體社運.....	21
小結：.....	25
研究問題：.....	25
第肆章、 研究方法.....	26
第伍章、 研究發現.....	28
一、 個人主體的發展.....	29
(1). 倫理實體 (ethical substance)：個體的焦慮感受.....	29
1. 透過網路與學校得知課綱議題.....	29
2. 因困惑國族認同而產生興趣.....	31
3. 課綱議題切身相關卻缺乏社會關注.....	31
4. 在課綱議題與家人產生政治立場的衝突—偏藍家庭.....	32
5. 感受到社會不公義正在發生—偏綠家庭.....	33
6. 想突破學生的刻板印象.....	34
(2). 屈從模式 (the mode of subjectivation)：解決焦慮的方式.....	36
1. 採取社會抗爭的方式—以三一八占領立法院為參考對象.....	36
2. 用 facebook 進行發聲與串聯.....	37
(3). 自我實踐 (practice of self)：打造倫理主體的方式.....	39
1. 透過 Facebook 協力合作.....	39
2. 用 facebook 直接發布新聞稿與聲明.....	42
3. 在校內舉辦活動 讓校內師生了解課綱議題.....	43
4. 遇到反對力量時 採取協商作法.....	45
5. 占領實體空間 衝進教育部.....	46

(4).	倫理目的 (teleology)	48
1.	讓社會正視學生的聲音	48
2.	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49
二、	自我主體到社群主體	50
(一)、	組織串聯	50
1.	線上分享合作	51
2.	線下參與互動	51
(二)、	組織自主性	52
1.	學生主體被質疑	53
2.	與政黨和利益團體保持距離	53
3.	打造具有高中生色彩的運動	56
(三)、	組織認同	56
1.	尊重不同意見 學習多數決	57
2.	虛心接納來自組織外部的批評	58
三、	社群主體到歷史主體	59
(一)、	改造政策訴求	59
(二)、	改造公眾意識	61
1.	培養出質疑新聞報導的能力	61
2.	透過新媒體突破傳統媒體的意識形態	62
3.	深化高中生的公民意識	64
4.	改變家人政治取向 關注候選人政策	67
5.	促成社會共同關心課綱議題	68
第陸章、	結論	70
一、	高中生倫理主體的展現	70
二、	社會運動素人也可以營造社群認同	71
三、	以社會運動改造台灣文化價值	72
四、	Touraine 的行動者主體三面向架構化	73
五、	研究限制與建議	74
參考資料：		75
附件一	大事記	78
附件二	受訪者列表	79
附件三	訪談大綱	81

謝誌

從進入新聞所到即將畢業的現在，我很慶幸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人，身邊有一群愛我的人，也讓我找到想做的事。

還記得進入新聞所面試前，總聽人說口試老師會問：「你要當記者嗎？」說真的，我不是那麼地確定，但還是只能準備著一貫的口試回答，我會試試看。我在新聞所度過很快樂也很辛苦的時光，這大概是繼高中之後我唸書最認真的時間了，高中時為了升學而唸書，但是在研究所裡，我學習得很痛苦也很愉快。跟涵文、瑞敏、椀齡一起在剪輯室剪片到半夜的時光、跟華銳在研究室討論視覺化主題到半夜的日子、跟邱筠、琬芸遠到小林村採訪的夜晚、跟軒翎鼓起勇氣用破英文殺入小菲律賓區採訪的時候.....，還有自己繪圖、寫稿、約訪的無數個夜晚，我都無比珍惜。我想對我的爸媽說，雖然，我沒辦法賺大錢，雖然，媒體環境不太好，我可能會讓自己有點辛苦有點奔波，但我很喜歡，我找到了想要做的事，就是成為一個記者。

首先謝謝我的指導老師，錦華老師，從一開始的選題與討論，老師都給予我極大的自由。經過一學期有點痛苦的讀書會後，我很興奮地發現 Touraine 的主體論述十分適用於我的研究主題。寫論文真是檢視自我的最佳途徑，許多壞習慣在寫論文時期一覽無遺，文字上的缺點、偷懶、粗心等等，十分感謝錦華老師耐心地修改和建議，給予我極大的幫助。

這篇論文能夠完成，最需要感謝的是願意接受訪談的受訪者們，沒有你們，不會有這篇論文。謝謝你們面對我的各種問題，總會耐心地回答，甚至敞開心胸誠懇地回應。我希望能把這篇論文跟你們分享。

再來，我要感謝我的伴侶許博竣，謝謝他總是給予我最多的支持與包容。他是我每次寫完稿、剪片完第一個看到的人，總是給予我誠摯的建議，他也曾被拖著到處採訪，願意跟我討論各種議題，互相分享彼此的看法。在寫論文期間，總是幫我買飯，我有陣子閉關，還長達十一天沒有出門，仰賴博竣的物資援助，真是太感謝他啦。偷渡我的三隻貓，寫論文很累時，能抱一抱牠們就很紓壓。

謝謝邱筠，在我每次崩潰時，總會給予我實質的幫助，還有溫暖的安慰；謝謝梁瑜，我最要好的朋友，我真的很開心妳回來了，口試時，看著妳，我就覺得我可以，我要講得很好；謝謝拉拉，一直關心著我，妳讓我的研究所生活很溫暖；謝謝我的弟弟，一起生活時，也時常照顧著我，雖然晚了妳一步畢業，但我會比你早工作喔；謝謝我的爸媽，在聽到我的論文主題時，也給予很正面的肯定；謝謝媒觀的大瑋、子瑋、福岳老師、炳宏老師以及其他的所有同仁，媒觀給我很大的自由與空間，除了可以跟我討論論文，也十分體諒研究生，實在是優質良心企業；謝謝元瑜，在我萎靡時，會找我吃飯，確認我還活著；謝謝斯佳，能跟妳一起準備考試、讀書、聊天，互相鼓勵對方，是我的一大動力；謝謝家慧無私地跟我分享論文準備過程；謝謝鬼鬼與學展幫我介紹受訪者；謝謝涵文、瑞敏、椀齡、驚人、思云、圓庭.....還有許多曾經協助過我的人們。

新媒體社運行動者的主體性探討－以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為例



摘要

2015 年的五月開始，台灣的新聞媒體上出現高中職學生反對課綱微調而行動的身影，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由高中職學生為行動主體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稱為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主因是高中生反對教育部與國家教育研究院在 2013 年以不公開的方式進行了高中國文和社會領域課綱微調。隨著公民團體、學者和教師等陸續針對課綱調整提出異議，認為課綱調整在程序上有嚴重瑕疵，內容更明顯違反學科專業，全各地的高中職學生紛紛響應，透過新媒體的使用，進行線上的串聯，與線下的實際行動。

針對反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本研究將聚焦於此運動中參與學生的新媒體使用，採取深度訪談法，共訪問了十一名參與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學生。理論依據是法國學者 Alain Touraine 行動者主體理論，並加以修正，從三個面向，剖析行動者所展現的主體性與主體化過程。

研究發現，首先，在「個人主體」部分，學生們因課綱調整所引發的焦慮感，迫使他們投入運動，他們希望社會能正視學生的聲音，並將自己打造成維持公平正義的公民。在「社群主體」面向，參與學生透過新媒體工具以集結組織；他們學習溝通妥協、營造社群認同的同時，也要求維持自主性。整體運動也是這群高中學生蛻變為「歷史主體」，不但重塑了自我價值和公民意識，並進而因為推動社會改革，促成了課綱政策的宏觀改變。

關鍵字：杜蘭、主體、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高中生、倫理主體、社群主體、歷史主體

From May 2015, some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began protesting against curriculum changes mainly through new media. In Taiwan, this social movement is the first one raised mainly by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movement is called Anti-Black-Box Curriculum Movement. Because the protest students claimed tha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ttempted to modify the guidelin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in viol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new curriculum were not professional. The protest students in the movement used the new media to connect with others online and to launch various protests in the real world. They have successfully inspired students everywhere in Taiwan to respond to this mov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ocial networks settled by th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Meanwhile, this paper shows how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constructed their subjectivity through different phases in this movement with Touraine's notion of social actor and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used the research method of in-depth interview and has interviewed eleven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have participated the movemen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phases for these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ir subjectivity. The first phase was to become an ethical subject, i.e., students felt the anxiety of black-box process of curricula modification and decided to participate the movement. Those students interviewed considered that the society should respect their thoughts and they wanted to play a role as a citizen who cares about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public policy. The second phase is communal subjectivity, that is, students learned to align other groups and try to cooperate and negotiate with various opinions. In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tried to keep their autonomy and maintain their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The third phase is the historic subjectivity, which means that th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developed their social role and cultural values, as well as have changed social policies.

Key words: Touraine, subject, subjectivity, Anti-Black-Box Curriculum Movement, high school students, ethical subject, communal subject, historical subject



第壹章、研究目的

2015 年的暑假，正是高三學生考取大學指定學科考試的時候，研究者當時在北京實習，朋友突然傳來微信訊息，告訴我台灣正在發生一件大事，有一群高中、職學生們積極地參與反黑箱課綱運動。因無法即時得知台灣的消息，慢半拍地惡補運動的過程，過沒幾天，我收到了參與學生林冠華的死訊，十分愕然地，看著運動越演越烈，恨不得馬上飛回台灣。

這場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由高中、職學生主導的社會運動讓人好奇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學生們主動投入這場社會運動，而在運動過程中又面臨了哪些挑戰。過去，父母與社會多認為學生應該乖乖唸書，以考上好大學為目標。學生們從國小、國中到高中、職階段，十二年的時間幾乎都在學校與補習班中度過，學生們的主體性被幼體化及忽視，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出現，跌破大眾眼鏡，成為媒體競相報導的焦點。

從三一八運動開始，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有年齡下降的趨勢，在媒體報導中，不乏高中生穿梭社運現場的身影。有趣的是，運動現場出現課輔教室，發起人認為採用課輔模式，可以讓到場的學生仍然能溫習課業，鼓勵更多高中、職學生參與。

關於課綱微調爭議，早在 2012 年之前便有公民團體、學者、與教師提出質疑。2015 年五月，由台中一中社團蘋果樹公社開出第一槍，發起反對黑箱課綱微調的靜坐運動，反黑箱課綱運動的主體從老師與教授轉變為高中、職學生。短時間內，全台各高中職在臉書上成立了兩百多個反黑箱課綱的粉絲專頁，運動訴求繼而由下而上發出。

從洪仲丘事件到三一八運動，近年來台灣的社會運動透過新媒體進行線上的串聯與線下的動員，反黑箱課綱運動同樣透過新媒體進行線上線下的動員。而面對主流媒體的報導，參與學生運用 facebook 粉絲專頁發布新聞稿直接發聲，學生也設有媒體聯絡人，除了以 facebook 對內連繫、對外宣傳，也與主流媒體

合作。



過去許多社會運動主要由教師或大學生、研究生發起，如野草莓運動、三一八運動等，然而，此次反黑箱課綱運動中，高中職學生站了出來，並自主組成多個社團、聯盟，自行策畫行動內容。在端傳媒 2015 年 8 月份的報導中，台大歷史系的教授周婉窈就表示對高中生主體性展現的驚訝。

「我真的嚇一跳，比你還好奇，」2009 年被找進高中歷史課綱修訂委員會，便不間斷關切課綱議題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回想一路鮮有呼應的吶喊，高中生的竄出讓她為之一振，「我從沒期待高中生要站出來，過去都覺得是我們的責任，雖然這的確和他們息息相關。」周婉窈也觀察到這批高中生相當自主，只個別找她演講，與其他公民團體的互動也都保持一定距離。（端傳媒，2015）

「高中生其實不會主動找我們幫忙，」人本教育基金會的秘書林郁璇說，「他們主體性很強。」（端傳媒，2015）

關於主體，法國社會學家 Alain Touraine 認為，面對社會的矛盾，個人開始產生經驗上的斷裂與衝突，面對焦慮的產生，個體除了思考，還會做出抵抗，成為行動者，因而產生了主體（Touraine，2000）。

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參與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學生主體化發展過程，行動者在運動過程如何以新媒體突破社會對於高中、職學生的刻板印象，發展自我意識？研究者與參與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行動者進行深度訪談，試圖了解參與者主體發展的過程：如何從個人主體的轉變，如何擴及組織層面，以及後續帶來的社會影響。

第貳章、反黑箱課綱運動背景介紹

一、課綱爭議（大事記請見附件一）

1990 年李登輝政府執政後，推行一綱多本政策，修訂新課綱，並於民國 88 年推行，在陳水扁與馬英九執政期間，也分別提出課綱修改¹。過去大中華的思想，由李登輝上台後，逐漸將台灣史比例增加，然而，無論是陳水扁執政時期，被批評為台獨思想的 95 課綱，或是調整後的 98 課綱，甚至到馬英九執政後，引起這次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 104 課綱，政府在課綱制定上，似乎每換了一個執政者，就輕易換了一套教育內容，課綱制定往往是符合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課綱調整影響的層面將不只是現在的高中生，更多是關係著未來學生們的權益。

2014 年教育部舉辦公聽會，宣佈將調整 101 課綱，官方認定僅「微調」101 課綱中少數的錯字及用語，並提出 104 課綱。然而，歷史學者周婉窈（2015）統計指出，台灣史課綱中，字數更動達平均百分六十的幅度，她認為這並非官方所說的「微調」。因此，專家學者對 104 課綱微調提出兩點質疑：程序的嚴重瑕疵、內容違反學科專業（薛化元，2015）。

在程序的部分，過去的課綱制定都是經過課綱委員會決定，委員成員來自專家學者以及高中教師，課綱制定後，經過試教並檢驗，才會公布課綱規範（周婉窈，2015）。然而，馬英九政府執政期間，改成立檢核小組，小組成員的背景並不盡然合乎學科專業，且又不公開小組成員及會議內容，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另外，也有教師反映，課綱審議的公聽會公文在公聽會舉辦前兩日才送到學校，導致教師來不及參加，甚至有學校根本不知道（周婉窈，2015）。

至於內容的部分，則是涉及國族認同、大漢族史觀、去日本化等爭議。教育部公告的課綱撰寫原則中明訂，課綱做為教學與考試的參考依據，原則上，應該要簡明、開放，但專家學者認為，104 課綱微調中，充滿細節性的指示，並具體規範用詞，例如：「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玉山編輯部，2015）。在此次微調的課綱中，官方說法為在中華民國憲法框架下制定課綱，並以中華民族為文化主體，因此在微調的內容中，多採用避免臺獨且符合中國

¹一綱多本政策，台灣教育改革運動的一部份，開放各廠商自行編寫教科書，並將選擇教科書的權力交給各國中與國小自行決定，教育部只負責設定課程大綱，以及審查廠商出版的教科書內容。在郝柏村內閣時期提出，於連戰內閣時正式推行。
（取自維基百科：[/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7%B6%B1%E5%A4%9A%E6%9C%AC](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7%B6%B1%E5%A4%9A%E6%9C%AC)）

史觀的用詞，例如「中國」改成「中國大陸」（維基百科，2016）。專家學者認為這樣的調整方向忽略了原住民族等其他族群的觀點。其他被外界提及的爭議調整內容如：公民課綱中刪除了「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內容，地理課綱中「外籍新娘」、「菲傭」等名詞遭民間團體抗議，國文課綱中則是增加了文言文的比例，而歷史課綱則是此次最大幅度的調整，增加中國史的比例外，也明訂了許多用詞（維基百科，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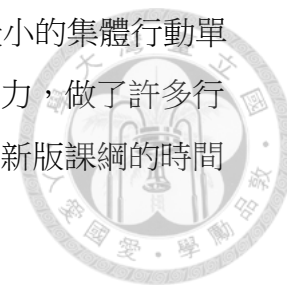
多年來，公民團體、專家學者奔走呼籲，希望制訂法制化、彈性的教育課綱，然而，皆未引起社會廣大的關注。然而，此次微調的課綱中，同時涉及了程序以及內容兩方面的爭議，涉及層面廣大，更多專家學者以及公民團體站出來反對爭議課綱。而在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真正開始的前幾年，社會也慢慢累積了一定不滿的能量，從反媒體壟斷、洪仲丘事件再到三一八運動，數萬人透過網路社群的號召，在短時間內走上街頭，表達對於社會的關心與憤怒。三一八裡，年輕學生的憤怒，也成為反黑箱課綱中高中生的能量。順著這股公民不服從的力量，高中職學生也紛紛出來表達自己對爭議課綱的想法。

由於此次的課綱微調爭議中，涉及層面廣大，與學生最相關的除了課綱如何影響到自身的權益之外，還有外界最為關注的程序以及內容兩個部分。而課綱調整的方向與執政黨色彩相關，課綱調整內容涉及了統獨、藍綠執政的爭議，因此，在本研究中，為了解參與學生的主體轉化，也會關注不同政治背景對他們在運動過程中的主體所造成的影響。

二、 北區反黑箱課綱高校聯盟

2015年五月一日，台中一中學生率先發聲，於校內發起抗議行動，一個月內，有數百間的學校在 facebook 響應，紛紛成立粉絲專頁，這些學校更進一步透過網路集結，成立區域型的反黑箱課綱微調組織。然而，這些區域型組織初期只是平台，作為個體與群體連結的工具，直到全台的大型活動開始後，才積極運作。五月到六月間，各校與各地都進行校內與地方性的運作，一直到七月份，跨區域的合作更加頻繁，行動更加緊湊，才開始了正式組織的運作。

從學校組織再到地區性行動，參與者多以學校組織做為最小的集體行動單位，然而，在運動過程中，行動者都感受到運動的侷限性與壓力，做了許多行動也擁有媒體曝光，卻仍停留在同溫層，面臨開學前即將採用新版課綱的時間壓力，參與者希望可以讓議題擴大升溫。



「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以下簡稱北高盟）由來自台灣北部地區的高中職學校組織所組成。由於北高盟發起多次全國性活動，因此本研究與北高盟決策成員進行訪談，並在此做背景介紹。參與學生在加入北高盟前，有些人已經是學校組織的代表或是成員，也有人是直接加入北高盟。一開始北高盟被外界認為是象徵性的意義，並非正式的組織，而是一個社群媒體平台，集結各學校組織，因此北高盟一開始的組織較為鬆散龐大，成員的游離性也高。

在運動初期，部分組織成員還是希望以學校組織為單位，與北高盟合作但保持距離。參與者面臨地區性或是小規模活動時，選擇以學校組織為單位進行，若是規劃大型的活動，則會透過區域型組織來行動。

在北高盟內，一開始採投票多數決的方式來進行決策。北高盟的第一場行動是經過成員兩個星期的討論，於六月十五日發起「第八節突襲」，來自七個學校，三十名學生²在北一女校門口前，手拿標語、發放傳單，希望透過多校聯合的方式提高外界對課綱議題的關注。

從六月開始，北高盟開了幾場會議討論行動方向，直到七月初，才決定要成立決策小組，設有總召、發言人、媒體聯絡人、NGO 對口、內部協調人、及媒體工作分配者共六人，但職權劃分並不是完全切割開來，也會互相支援。參與學生表示，在一次次開會過程，光是決策就十分消耗時間，若沒有分工，可能會讓後續的行動變慢、媒體曝光減少，因此他們才以投票的方式選出決策

² 北區反課綱微調聯盟昨天首度舉行策劃近兩週的「第八節突襲」計畫，第一站就選在北一女門口。昨天下午五點十分開始，來自建中、北一女、師大附中、成功高中、內湖高中、華江高中、內湖高工的卅名同學，身穿制服，手拿標語、旗幟、發放反課綱傳單、貼紙等，約一小時結束，盼增加各界與學生們關注課綱議題。

（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89759>）

圈。決策圈外的成員也有分組，在每次討論過程，將各組的意見彙整後，由決策圈討論做出決定。

然而，線上的串聯容易，但是線下的實際行動卻是困難重重。抗爭持續到將近七月底，這群行動者各自承受著不同的巨大壓力，面對家人的不諒解與各界的質疑，卻看不到運動的進展。

7月30日，通訊軟體群組中傳來林冠華自殺的消息，參與者不敢相信，直到十多分鐘後，新聞陸續報導，他們才確定了運動夥伴林冠華的死訊。這天是林冠華的20歲生日，早已有所查覺的運動夥伴選擇用不同的方式陪伴他，甚至通知學校與警方，但還是挽不回一條寶貴的生命。林冠華在死前曾透露，8月1號新版課綱上路，他會在前一天用自己的方式阻擋課綱。

林冠華用他的生命為課綱議題投下一顆震撼彈，政壇與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紛紛出來表態。參與者回憶起當時情況說，那時運動的確遇到瓶頸，想了非常多方案要執行，但沒想到林冠華卻決定輕生，突來的噩耗並沒有打垮他們，他們必須執行林冠華的遺願，並且義無反顧地採取了最激烈的方法來抗議。八月份參與者陸續退場，運動才暫時宣告落幕。

直到2016年總統與立院大選後政黨輪替，4月29日，立法院決議通過，要求教育部退回103年度調整的課綱，5月21日教育部長潘文忠發出聲明，宣布停止微調課綱版本。

在這場運動中，參與的學生從運動中學習民主運作和組織協調，並展現高度自主性與主體性，打破了主流社會對於高中職學生的想像。

第參章、文獻回顧

一、Touraine 的行動者主體轉化

本研究援引法國社會學家 Alain Touraine 的「行動者主體」概念，來分析參與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學生的主體化過程。



法國學者 Alain Touraine 既是社會運動者也是社會學者，他擁有豐富的運動經驗，也關心全世界的社會運動。不同於英美主流的社會學派，他發展出行動社會學（Sociology of Action），並以具前瞻性的眼光看待 21 世紀以來的社會運動。Touraine 認為當代社會面臨的危機就是個人被金錢、科技、消費與競爭等宰制，全球經濟的不均是全球化影響的結果，也是我們現存的社會，全球化與經濟的快速成長摧毀了社會與文化對社群生活的掌控，個人主體也隨著社會的變化產生分裂；然而，Touraine 也指出當代社會的衝突已並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資本家與勞工間的衝突，而是大眾文化、民主社會所產生的衝突，例如現有的政治系統無法回應社會對於平等與公平的要求。因此，Touraine 認為必須透過追求新型態的現代生活，才能解決人們對於世界的斷裂感，而新型態生活的建立必須基於主體的建立（Touraine，2000）。

Touraine 認為行動者必須先是個公民，因為個人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是息息相關的。由於現代社會中的各種規訓和支配機制，造成當代生活的危機，個人因而感到壓迫，轉而省思和抗拒社會的規則，尋求自身的認同（Touraine，2002：92）。Touraine 指出行動者在建立主體的過程應是自覺且主動的，是個人對工具世界、文化經驗與個人人格的重新確認，因而主體是與他人具有差異性的；個人的主體便是呈現了社會生活中不同的衝突，個人希望改變社會而做出行動，而這也具有從下而上的改變意涵（曾韻潔，2014）。

談到個體的社會行動，便必須討論社會運動的意涵。社會行動者的概念與 Touraine 所強調的「社會性運動」是一體的。Touraine 在其定義的社會性運動（societal movement）中，提出兩個關鍵概念，即「歷史質」與「主體」。歷史質指「社會實踐的一套措施（instrument）和一組文化旨向（cultural orientation）」，是一套文化的模式，也是抗爭的場域。社會性運動就是透過集體抗爭，要求轉

變文化旨向，並將其具體化成一個特定的社會形式的實踐。Touraine 以勞工運動為例，勞工運動從一開始爭取勞工的特定權益，若能開展到爭取普遍勞工的生存權、工作權，運動成為與現有文化價值的抵抗，便能稱為運動訴求的上升，而運動的上升也是個人主體化以及改變社會制度的過程，從僅是反抗某個具體現象，到為了具有社會普遍性的權益發聲，Touraine 認為這就是社會性運動為社會發聲的代表（丘延亮，2002：18）。

主體則指「個人或集體成為行動者的過程，也就是個人有意識的參與改變歷史質的過程」（丘延亮，2002：39）。Touraine 所稱的主體即是個人或集體成為行動者的建構過程（丘延亮，2002：39），主體的產生是在和既有社會秩序或倫理規範有所衝突時所彰顯（Touraine，2000：95）。在社會性運動中，主體並非總是勝利的，因為民主政治體現的是個體爭取改革的意志和行動，民主政治是要求改變社會的不公正，追求擴大自由和責任的範圍，因此，Touraine 認為民主必須定義為「主體的政治」。

此外，Touraine 也強調，主體的展現並非單指個體生活上因經驗矛盾而產生的焦慮，若僅停留在忍受苦難，而無所作為，是無法建構出主體的（Touraine，2000）。個體需要透過抗爭那些威脅他的力量，才能從中創造出主體。本研究因此欲探討在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中，參與學生抗拒哪些既有的規範與秩序，如何從中建立「主體」？主張何種文化旨向並付諸實踐？如何形成集體和行動？主張何種文化旨向並付諸實踐？希望造成何種改變？具有何種歷史質的意涵？是否形成了社會性的運動？

然而，主體化並非一蹴可及，主體化也並非個體突然靈光乍現的想法就可達到。夏曉鶯（2006）提到，主體化的過程是不斷反覆進行的，無法一次到位，在每一次的衝突和焦慮中，透過對話、反思以及行動才會形成主體（夏曉鶯，2006：40）。在個體的層次上，Touraine 並未細緻區分個人主體如何轉化，因此，以下將援用 Foucault 的「倫理主體」做為個人主體層次的補充。

二、Foucault 的倫理主體



在個人主體化的過程中，可分為兩種層次，一是個人決定自我的價值和行動選擇，另一是形成及參與社群的個體價值和行動轉化，這兩個層次並非二分，但在概念上可以分別討論。Foucault 對倫理主體的討論可以作為討論「個人」主體化過程的架構，因為「主體性」本身即是個人對自我價值的選擇和建構。

張彥南（2007）在其研究《傅柯晚期論主體與自我技術》中針對 Foucault 的倫理主體做了清楚的介紹，他提到 Foucault 的倫理主體共分為四個面向：倫理實體（ethical substance）、屈從模式（the mode of subjectivation）、自我實踐（practice of self）與倫理目的（teleology）。他指出 Foucault 晚期的關懷在於倫理主體與個人技術，在其著作《性史的第三卷》中，以希臘人主體的建構來發展倫理主體的概念。張彥南也提到，Foucault 認為道德準則是加諸於行為之上的，道德準則包含了禁止與允許，Foucault 舉了一個例子是：只能跟自己的妻子從事性行為，這就是一種允許與否的道德準則，道德準則的另一個面向是對自我的評價，Foucault 將它稱為「倫理」（張彥南，2007：25-34）。

鄭宇君（2008）在其研究《新聞專業中的真實性：一種倫理主體的探究模式》中則提到，Foucault 在倫理中加入了新的意涵，倫理不再只是一套道德規範，而是自我如何轉變。她認為 Foucault 真正關心的是人面對倫理掙扎時採取哪些行動，個人的感受及想法又是如何，Foucault 關心的是自我與自我的關係，而個體與自己的關係，也將決定個體如何把自己打造為一個有道德的行動者（鄭宇君，2008：89-90）。在倫理主體四面向中，張彥南也強調主體化的過程是不斷反覆進行的（張彥南，2007）。

本研究整理張彥南（2007）和鄭宇君（2009）對 Foucault 倫理主體的解釋，共可分為四個面向：

1. 倫理實體（ethical substance）：Foucault 認為，在自我當中，與道德最相關的部分就是自我的感受，作為倫理主體的開端，感受也就是良心不安的部分，即人們會感到焦慮的原因。

2. 屈從模式 (the mode of subjectivation)：引發人們辨識出自己道德義務的方式，像是人們焦慮時，可能會透過宗教中的律法來行事，也就是人在焦慮的情況下，會思考如何改變。
3. 自我實踐 (practice of self)：自我實踐就是自我技術 (technology of self)，即為了達成倫理主體而改變自我的方式，例如要對妻子忠誠是有很多不同的實踐方式。
4. 倫理目的 (teleology)：指人們賦予自己道德規範時，希望達成什麼目標。

在張彥南的研究中，主要介紹 Foucault 晚期研究轉向主體的原因以及主體的內容，而鄭宇君的研究中則以她個人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驗作為例子，分析新聞專業中的倫理主體。

本研究中將以李映昕 (2015) 《從 Foucault 倫理主體理論詮釋 318 運動期間台大新聞 E 論壇參與者的新聞實踐》的研究做為倫理主體分析的主要參考。李映昕的研究探討台大新聞 E 論壇的記者，在新聞編採過程中，如何將自己打造為倫理主體，與本研究欲分析的主體較為類似，同樣是一群參與者在集體行動的過程中，如何將自己打造為倫理主體。她將倫理主體分為兩大面向，即「將自己打造成倫理主體的方式」以及「倫理主體的感受與成長」，第一個面向指的是，什麼刺激會使得這些參與者進行「自我實踐」，而這也能回應「屈從模式」，也就是驅使個體行動的原因。「倫理主體的感受與成長」則是參與者行動後的自我感受，而這個感受又與未行動前有何差別 (李映昕, 2015)。

研究者認為 Touraine 在個體主體化的過程中，並未詳細的區分主體化的面向，而 Foucault 的倫理主體四面向提供了清楚的架構，可以用來補充個體主體化的進程。

在本研究中，因參與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學生缺乏組織運動的經驗，而且處於準備大學考試的階段，他們為什麼會突然決定投入一場社會運動？當他們在面對課綱議題時，接受到什麼刺激，才會促使他們進行行動，以及他們行

動的原因是什麼？這些可以用「將自己打造成倫理主體的方式」來詮釋，以及用倫理目的來解釋這些參與的個體希望達成什麼目標。



三、 個人主體到社群主體

在 Foucault 關心的倫理主體中，侷限在個人自我的關照，而 Touraine 所謂的主體並非單指個人。Touraine 認為主體如何存在，必須結合個體的生命經驗以及集體的行動，意即要先擺脫不同權力對自己的壓迫，讓自己成為主體，再透過與其他主體相連結，形成社群，才能進行社會性運動。因為社會性運動的目的就是改變歷史質，達成某個特定的訴求，而要進行社會性運動無法透過一個人的力量，必須透過集體行動（Touraine，2000）。

而集體行動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社群的產生。Castells 認為社會運動是一種情緒運動，「在認知一個不正義的行動以及辨識應為此負責的對象時，憤怒感隨之遞增」，個人將不滿的情緒轉化為行動，但個人的不滿與憤怒必須與他人相連結，才有機會形成社會運動的力量（林靜伶，2014，p.6）。

在李映昕（2015）的研究中也提到群體的重要性，在她的研究案例—台大新聞 E 論壇的記者中，除了記者個人的倫理主體建構，更可以看到群體的重要性，她認為與他人的連結，是 Foucault 在倫理主體中並未提到的部分，台大新聞 E 論壇的記者能夠踏出自我實踐的重要一步是因為群體的存在，知道有其他人要一起做，更會引發成員對於新聞的責任感。

夏曉鵬（2006）在其研究〈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差異政治、主體化與社會性運動〉中討論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她特別強調了社群主體的重要性。來自各地的新移民女性在識字班中建構個人主體，在後續發展社群主體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凝聚了共同的社群感，社群感建立在組織內部的衝突與溝通上，解決衝突的方式來自對話以及個體的反省。因此「社群主體」就是建立在社群感的凝聚上，有了「社群主體」才能進行更多的培力以及後續更多的集體行動。而夏曉鵬認為 Touraine 在其論述中，並未提到個人主體到社群主體的過程，忽略

社群主體的存在。



但 Touraine 其實是有提到社群的概念的，馬祥祐（2003）的研究〈村民自治—大陸社會力的重聲〉，主要探討中國社會中的村民自治，在中國社會中，民間的訴求往往先於上層的制度規畫，民間做出行動後，政府階層才會跟上。他在研究中以社會力的說法來定義民間力量的集體擴張。他提到 Touraine 對於社會力的解釋，並強調 Touraine 認為社群組織是重要的，Touraine 認為社會力必定需要組織，這個組織必須有經營，且是發生在社會整體的歷史情境下，組織對內部有其支配力，有資源且可以行動的能量，組織同時也是歷史性的行動者。也就是個體會透過社群的集結成為組織，並向政府提出訴求，做出社會改革。

Touraine 認為組織具有以下四個基本面向（整理自馬祥祐，2003）：

1. 組織內部的衝突與一致性，參與社群的行動者帶有各自的立場，因此無法完全解決社群內部的衝突，但必須保持在同一個方向上前進。
2. 自主性，組織在爭取權益的同時，也會保持與其他團體的距離。
3. 行動策略，每一個社群往往都是想進行社會改革，因此會透過某些策略來達成目的。
4. 組織往往會透過社會運動爭取訴求，而運動內容與行動者的階級關係和認同意識有關。

而關於社群主體的特性，林靜伶（2014）在《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的界定與語藝選擇》中提到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的特性，她以 Castells 對網路社運的觀察提出社運行動者的主體特性，而這部分也可以呼應 Touraine 的行動者主體。

林靜伶提到，Castells 認為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的興起，以網際網路做為數位溝通平台，訊息傳播不再只侷限於少數人或是傳統媒體，個人可以同時是傳播者也可以是接收者。大眾自我傳播建立水平互動與連結的基礎上，難以被組織與政府左右，個人展現了高度的自主性。而網路不僅具有上述的工具性意義，更重要的是為網路社運帶來基礎，提供運動中連結、擴張、

審議、決策等發展。Castells (2015) 認為網路社運的出現產生了新價值，即指個體性 (individuation) 與自主性 (autonomy) (林靜伶, 2014)。

個體性強調個人的規畫將引導至個人行為的產生，更可能進一步與群體做連結，產生具有共同理念的社群 (林靜伶, 2014: 11-12)。而自主性則有個人層次和群體層次的差異，對個人來說，即不受其他組織左右，有自我決定判斷的能力，而個人透過網路，找到志同道合者連結成群體時，則進一步建構出群體的自主性 (林靜伶, 2014: 11-12)。而行動者的主體更可以從「能動性」與「反思性」的觀察發現，黃鈴媚、沈錦惠與曹開明 (2014) 以「電子符號行動者」探討網路時代的閱聽人主體性，「所有的行動者都是參與者，說寫閱聽皆行動，只是涉入程度不同」，「基於行動者的反思性，行動者就是學習者，因反思性而產生角色的變化」 (林靜伶, 2014)。

在林靜伶研究中提到的行動者特性「自主性」、「個體性」、「能動性」與「反思性」，符合 Touraine 描述的行動者主體特質。其中，「自主性」、「個體性」與本研究中欲討論的新媒體社運組織最為相關，因此將援用此二個概念。林靜伶的研究也指出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個體與社群的連結，行動者組成的群體也就是具有共同理念的社群，這個社群同樣具備了行動者的特性。

如何從個人主體上升到社群，打造出社群主體，Touraine 認為，要擺脫不同權力對其自身的壓力，就是讓自己成為主體，再透過相互連結的方式讓主體與主體溝通對話 (Touraine, 2000)。而個體相互連結為組織的下一步便是集體行動，然而，在組織行動前，組織內的成員必須先經過溝通，達到共識。夏曉鵬的文獻指出了社群主體就是組織社群感的建立，如何解決組織內部衝突的方法則又呼應了主體間的溝通對話。從林靜伶的研究中，更可以表現在網路社運中的社群是具備主體概念的，以網路社運中的「個體性」來解釋組織的串聯過程，而行動者的自主性也會反映在「組織的自主」上。

因此本研究在社群主體的部分提出「組織的串聯」、「組織的自主性」、以及「組織的認同」，來分析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參與者如何打造社群主體。



四、社群主體到歷史主體

要達到社會改造必須仰賴集體行動的力量，打造社群主體是進行集體行動的必經過程。Touraine（2000）指出，歷史行動就是行動者想突破自己所處的歷史質。社會性運動是個體所進行的集體抗爭，以衝突的形式來尋求文化價值的重構，而達成歷史主體的做法便是改變歷史質。

然而，改變社會歷史質，單靠個人力量是十分薄弱的。在現代生活中，Touraine 認為人們試圖重建並保護人類的自由，使得自由不受到各種社會權力的威脅；人們也為了能創造自己的個人生活的種種自由而戰。Touraine 觀察到社會的改變，因此，他認為要解決個體在現代社會所遭遇的痛苦，就必須要成為主體（Touraine，2000）。當不同個體經過主體化過程並互相串連後，可以透過社會性運動來扭轉歷史質。

然而，個人主體的形成不必然轉變成歷史主體，個別地逃離與抵抗在 Touraine 的定義中都可視為個人主體的展現，但這並不能改變歷史質，個人的主體要轉化為歷史主體，需要透過組織的形成與抗爭，將個人行動轉為社會性運動（夏曉鶯，2006）。以夏曉鶯（2006）的研究舉例說明，來自各地區的新移民配偶在識字班中，透過對話讓她們勇於分享自我經驗，然而因為國籍、族群等差異，很難對識字班產生認同感，經過多年的培力，跨越衝突以及讓新移民配偶意識到識字班的重要性，並自主打造集體空間，進一步創立了南洋台灣姐妹會，才形成社群主體。

夏曉鶯（2006）認為以社會運動的主體性來說，移民本身的聲音是移民運動取得社會正當性的必要條件，但若缺乏上述的蹲點與培力過程，新移民配偶的主體性難以展現。新移民配偶跨越傳統身份的認同，肯定自我意識，也因為組織認同感形成，促成南洋台灣姐妹更多的行動，他們讓移民人權修法聯盟更了解移民困境，將移民面臨的問題轉化為集體行動。新移民提出他們認為不合理的法令規範，並與其他組織結盟上街頭抗議、投稿、向政府官員陳情等實際

作法引起大眾的注意，夏曉鴉認為上述就是在透過集體行動來「改造公眾意識」與「改造政府作為」，個體在參與運動的過程會逐漸轉化成「歷史主體」。

關於跨越身份的認同，Touraine 也提到學生應該脫離社會角色，培養主體性。他認為有些學校只是維護體制，而非滿足學生知識（李仁佐、詹益欣，2015；Touraine，2014）。Touraine 在著作《我們能否共同生存》中的章節〈主體的學校〉（A school of Subject）提到，他認為學校與家庭都應該在技術經濟與個人期望取得平衡，對於個人的期望，不能僅限於塑造既定社會需要的角色而是要重視每個人的不同需求。他也提到學校應該促進異質性與多元性；學校不能只是為了既定社會的利益，將學生訓練為工作者；而是要強化主體的能力，讓學生能有個人發展以及自我表達的能力（Touraine，2000）。

回到集體行動的部份，集體行動如何影響社會歷史質？Castells（2015）表示，如何評估社會運動的意義就在於運動對於當時社會與歷史造成的改變，以及對參與的個人造成哪些影響。

因此，本研究在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中，將以「改造公眾意識」與「改造政府作為」此兩點來觀察，運動是否改變了政府施為？在公眾意識的部分又造成哪些影響？而在個人的部分，將從參與者的觀點出發，來看待運動後，帶給個人哪些轉變與感受。

五、與主體相關的研究文獻

李仁佐與詹益欣（2015）在《以杜赫尼《行動者的歸來》觀點論全球化下媒體對運動文化之影響》中以 Touraine 的行動者主體的概念來解析媒體中的運動文化。在文中，作者點出在現代社會中人們不再透過抵抗來爭取權益，主體下降為個體。在社會簡化為國家機器、市場的情況下，需要重建一個新形態的社會，而新型態社會的建立才能使行動者歸來。作者認為職業運動的觀賞是大眾生活的一部分，但作者指出，觀眾似乎沒有意識到體育文化也受到全球化以及媒體行銷的影響，因此作者以 Touraine 的行動者主體提出解方，觀眾要透過

參與、體驗、深化媒體素養、進行批判媒體的行動，才能振興運動文化。文中對 Touraine 的行動主體已有初步的介紹，也賦予閱聽眾積極的作法，透過參與以及媒體素養的培力來建立更健全的媒體、閱聽眾與體育文化的關係。然而作者並未清楚說明媒體對運動造成的影響，以及參與的個體如何看待傳播媒體與運動的衝突，缺乏個體主體化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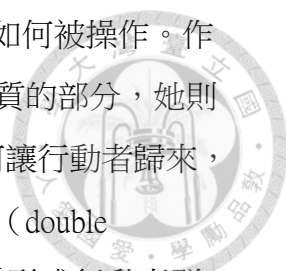
曾韻潔（2014）在《從參與到合作：以「樂山飲」與「母親的布」創作計畫為例》中，則是透過兩個藝術計畫來思考藝術如何定位自我的社會實踐意義。作者以 Touraine 的社會行動者概念出發，親自參與兩個藝術計畫，從計畫中反思自我學習的藝術如何與社會連結，以及自我的生命故事。作者在實踐過程也進行批判性的思考，並以「結盟式合作」的概念來說明個人的藝術可以參與社會，但又保有主體性，不完全被合作對象所影響。文中清楚點出個體在計畫合作過程，並非僅有情感的連結，而是個體的主體化過程。然而，文中聚焦的是作者本身的主體轉化過程，雖提到作者與社群的合作，但並未進一步闡述社群的轉化，僅停留於個體主體的層次。

而關於社會運動行動者與主體性的關聯，林靜伶在《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的界定與語藝選擇》中提到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的特性，包括個體性、自主性、隱匿、旁觀、能動性、反思性（學習）等（林靜伶，2014）。其中，個體性、自主性、能動性、與反思性與 Touraine 的行動者主體概念十分相似。

在林靜伶研究中提到的行動者特性，符合 Touraine 描述的行動者主體特質，也點出了新媒體社運中個體與社群的連結，行動者組成的群體也就是具有共同理念的社群，這個社群同樣具備了行動者的特性。

以上的文獻中，較著重在個體主體性，雖部分點出了個體與社群的連結，但並未繼續探究。以下蔡秀芬和夏曉鵬的研究則是在個體、社群與歷史主體部份都分別做出探討，也是本研究參考的核心。

蔡秀芬（2013）在〈祛魅、啟蒙與賦權：中國新媒體作為另類傳播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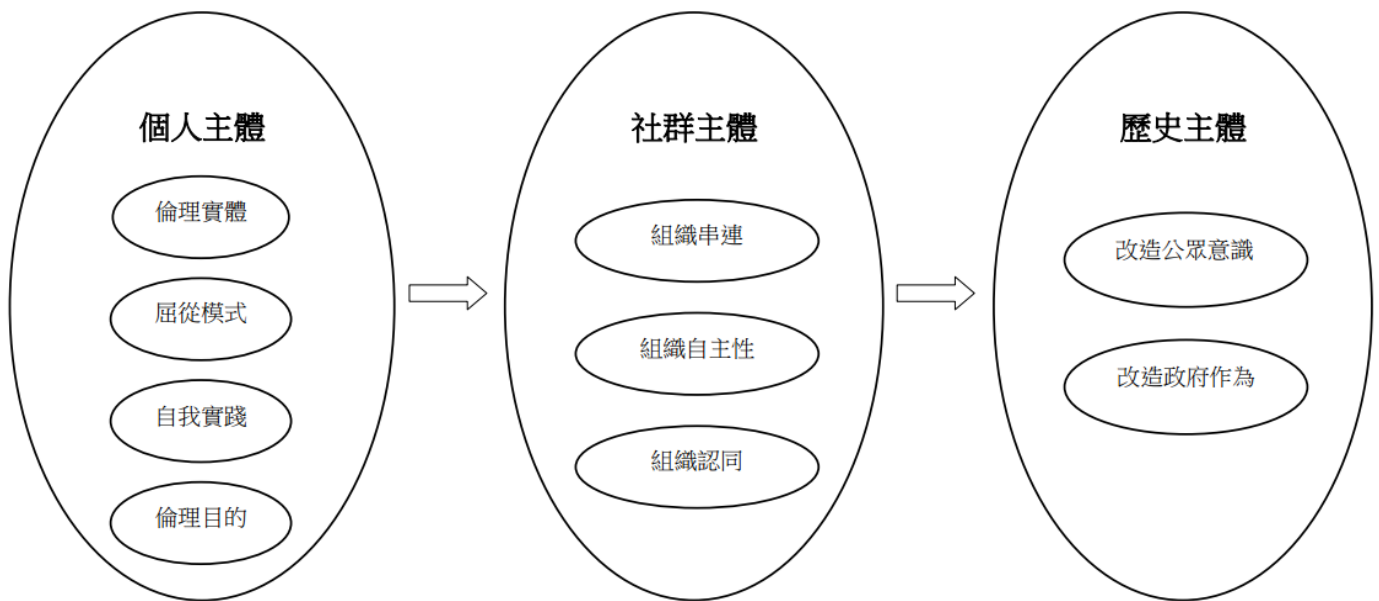


與影響探析〉一文中以 Touraine 的行動社會學探討中國新媒體如何被操作。作者探討行動者的動機、行動策略以及如何發揮能動性，在歷史質的部分，她則認為中國新媒體帶來公民社會的賦權（empowerment）。而如何讓行動者歸來，作者認為必須要「重建主體」，也就是進行一種「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其一是行動者建立主體性，二是與他人連結，「形成行動者群」，也就是「主體聯盟」。蔡秀芬根據行動者主體理論延伸出三個層次的「雙重運動」，第一個層次為建立個體的主體性，並與他人串聯為「主體聯盟」；其次是透過傳播歷程打破威權統治與市場獨佔，形成第二個「雙重運動」；第三，行動者將改變歷史質，行動者未必眾多，訴求並非推翻政權，而是從日常生活的實踐進行改變，以社會長遠的發展來看，是可以實踐社群民主生活的。此篇研究已大略將主體分為三個層次，並分別從個體、社群再到歷史主體做探討，但著重於中國新媒體應用所達到的歷史主體分析。

而本研究也將沿用夏曉鵬（2006）中梳理 Touraine 行動者主體的架構，夏曉鵬以自身參與的新移民運動做為例子，關注過去社會運動研究中忽略的基層社會運動參與者主體形成的重要性，結合跨領域理論，指出社會運動不僅有策略的運用，最關鍵的是行動者的主體化過程。夏曉鵬把新移民運動中的主體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個人主體的轉化，到社群主體以及歷史主體。

以夏曉鵬的研究來說明，新移民配偶在識字班上課的過程，從實用需求出發來進行培力，經過課程的訓練，新移民配偶從不敢表達，到願意分享經驗。然而識字班中有不同國籍的配偶，夏曉鵬觀察到在活動的進行中，有缺乏共識或意見不合的情況出現。在衝突中，經過「對話」讓新移民配偶先以旁觀者角度審視問題，在進入對話，成為行動者，經過反思、分享與討論解決問組織內部的衝突，在多年的培力後，識字班成員開始協助其他弱勢的姊妹，並籌組南洋台灣姐妹會。識字班成員逐漸從身分的認同（politics of identity）轉變為肯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這挑戰了過去習慣的社會角色的認同，成員們肯定個人意志的選擇，同時也肯認其他人的意志與選擇，並且進行集體行動，挑戰不公義的法規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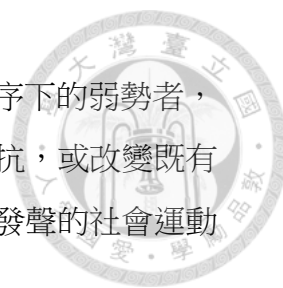
綜合上述研究，我們可以將主體化區分為個體、社群與歷史三個層面研究者整理（如圖一）所示。未必在所有案例中都具有三個層面的主體轉化，在涉及社會改造或是影響政府作為的案例中，較能夠看到三個層面主體化過程，像在蔡秀芬與夏曉鵬的研究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而本研究的案例一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也是涉及公共議題的發聲，個體感受到自己的價值觀與既有規範相衝突，因此他們希望可以透過行動改變既有規範。當個體主體化後，產生參與社會改革的想法，他們的想法可能與其他個體產生共鳴，並互相溝通合作，便產生群體，而社群感的營造將有利於集體行動的進行。進行社會運動也是個體實踐民主的方式。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是由高中、職學生透過新媒體所串聯發起，有別於過去的傳統社會運動，新媒體影響了人的行為，而新媒體的使用在三個主體化的層次下有哪些影響，參與者又是如何透過新媒體進行集體行動？本研究將在下一章節梳理新媒體社運的特質與運作。



圖一：個人主體到歷史主體的發展過程

六、新媒體社運與主體性

1. 社會性運動的定義



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將社會運動定義為「既有社會秩序下的弱勢者，透過集體的力量，企圖發展比較合理秩序的想像，並集體地抵抗；或改變既有體制的過程。」梳理台灣社會運動的脈絡，解嚴後，各種議題發聲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而這也符合 Touraine 對於社會性運動的定義。

而 Touraine 認為，過去社會學家以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來指稱社會抗爭與政治行動，社會運動容易與國家或階級意識形態結合，導致運動附屬於政治力量下（Touraine，2000）。Touraine 在此以 70 年代的社會運動為例，社會運動會快速衰亡的原因是其屬於政治運動，而女性運動則相反，並非附屬於政治之下，因而運動可以滲透入每個人的行為、家庭關係、立法與教育的概念。他認為集體行動的目的可能是為了維護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改變某一政權、或是跟文化與自由相關的抗爭（Touraine，2000）。

在「社會性運動的定義」，他則表示「社會性運動」是為了轉變與主要文化資源相連的社會支配關係，即「個人利益的集體抗爭以社會衝突的形式尋求文化價值的重建，……運動的發展是個人主體轉化為歷史主體的過程，也是社會性行動由反抗權力的抗爭轉向為更合理的社會發聲的過程」（丘延亮，2002，p.18）。

Touraine 認為過去的社會學家在社會運動研究中更重視政治力量的運作，而非行動者本身。然而，在現今的公民社會中，社會需求與政治力量的影響共同存在，社會性運動比社會運動更能直接連結到主體，因此，社會運動慢慢式微（Touraine，2000：97）。

Touraine 強調，社會性運動就是透過集體抗爭，尋求社會價值的重建。雖然社會運動與社會性運動都是集體動員，但社會性運動強調行動者的獨特性與個體性，彰顯個人主體的價值，個體將投入社會性運動視為改變生活的手段，而不只是因為政治或宗教的訴求。Touraine 更直接表達，主體的政治就是民主的特質，因為民主就是讓人人可以盡可能爭取生存的自由與權利，帶著彼此的

差異共同的生活著（Touraine，2000：284）。



2. 新媒體社運

而網路的發展，也為社會運動帶來不同的面貌。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在《台灣社運的網路經驗初探》中提供了跨越技術決定論的視角，他們認為台灣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是由社會差異、網路技術與社會運動三者所相互影響的。

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認為網路具備下列三點特性：網路的即時、大量、分享與互動性，提供社運者對內的溝通以及對外的動員，亦能觸及更多潛在的支持者。再者則是成本低廉，網路被視為公民可以直接發聲的媒介，無須透過傳統大眾媒體而能發表意見。第三，網路具備即時而不需同步的特性，可以達成彈性的溝通，更能使社運團體外部地觀看者產生同理心，進而增加支持者，擴大議題能見度。而跨時間與跨地區更能夠使得議題發酵，串聯起不同地區但有相同理念的人，發揮跨地區的動員能力。網路也提供了運動資源的募集，從線上募款到運動現場的補給品，讓線上的運動運作更加順利。

網路的特性已有豐厚的學術探討資料，目前大家關心的是，這些新科技工具如何影響人的生活，以及人們如何使用新媒體來從事社會運動。新媒體的興起，改變了社會運動的發展的模式，更能促進個體進行主體轉化。從茉莉花革命、野草莓運動、洪仲丘事件到三一八運動，這些運動皆是透過新媒體所發起。然而，並非是新媒體創造了集體行動的產生，而是新媒體搬除了許多障礙物。科技變得無所不在，科技已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讓我們視而不見，因而帶來改變，新媒體科技使得個體的連結變得容易，組織的形成更加快速，集體行動的門檻降低（Shirky，2011）。

集體行動的過程必然有組織的產生，在蕭遠（2011）對於野草莓與其他學運的比較中，可以發現，1980、90年代的社會運動，人際網絡是動員關鍵，多來自社團組織、學生會、NGO 團體。而學運中，運動領導者多以學生會幹部、社團成員、學運團體份子為主，三者間的成員也有高度的重複。參與者的生命

經驗較為類似，組織內部的統合性高，領導圈與圈外互動較佳，信任感也較強。而在野草莓中，則顛覆了此一運作模式，透過網路號召來的群眾，形成虛擬生態圈，且無領導圈，而是分組以審議式民主的方式進行討論與決策，這樣的情況下，人際連結斷裂、決策較無效率（蕭遠，2011）。



野草莓的組織方式顛覆了過去傳統社運中組織的型態，陳順孝（2015）於〈網路公民行動的集體演化：從搶救樂生院、野草莓到太陽花運動〉也運用了 Clay Shirky「無組織的組織」概念，由於網路的發展，傳播體系產生重大的改變，快速、即時、互動、跨時跨地等特性，使得網路社會運動的組織出現改變，突破傳統社運的組織決策、群眾參與與社會對話方式，網路社運讓組織方式更多元、靈活。陳順孝從搶救樂生院、野草莓與太陽花運動中說明網路社運的組織擁有快速聚合、網路協作與水平協作等特性，「無組織的組織」是公民傳播體系中演變而成的，透過核心組織的行動與論述、積極公民的參與和即興鄉民的支援，展現驚人力量。

然而，社會運動並非容易的事，Clay Shirky（2011）認為新媒體社會運動涉及三個層次，個體對現況的焦慮不滿，必須透過「分享」、「合作」才能有「集體行動」。「分享」是三個層次中最容易的，網路使用者經常將照片與消息上傳到網路上，供人觀看甚至共享這些消息，其他使用者在經過原作者同意下，進行分享、散佈。而「合作」則創造了群體的認同，使用者與社群進行對談，可以是個人的社交網頁或是封閉社團裡的交流，甚至像是維基百科的共同編輯。而最困難也是新媒體社運中最關鍵的就是「集體行動」，資訊分享會在參與者間產生共識，同時也要仰賴參與者共同合作生產，集體行動更進一步需要承擔共同的決策以及責任的分擔，參與者也共同創造群體的身分認同（Shirky，2011）。

洪貞玲在《我是公民也是媒體》書中，提到 Castells 觀察近年的新媒體社運後歸納的幾個特質，並用以檢視三一八運動。首先是多重形式形成網絡，即網絡可以提供去中心的互動；第二，運動占領都會公共空間，運動透過網路的串聯並占領實體公共空間進行抗爭；第三，運動是全球的也是在地的，運動超越

了歷史時間的限制，超越了個體的歷史經驗與過去被規訓的生活經驗；第四，運動是立即發生且迅速擴散的；第五，運動通常沒有領導者，在網路空間形成集體組織；第六，運動很少是預先設定的，行動者主體性高，可以直接參與並討論（洪貞玲，2015）。



而觀察台灣近年的新媒體社運可以發現，幾乎都使用了社群媒體 facebook 來做為串聯與發聲的工具，這也是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中，參與者最主要用來溝通、連絡與發聲的社群平台。facebook 由 Mark Zuckerberg 於 2004 年所創立，到了 2012 年全球突破十幾億人次，光是台灣，2013 年就有一千五百萬個用戶，且有一千兩百萬用戶是使用行動裝置登入（維基百科，2016）。過去研究指出，facebook 的三點特性為「使用者身分認同與建構」、「社交網絡」、「訊息通知」（陳蕾，2014）。facebook 可以有效的串連起人與人的關係，突破過去社運往往必須依靠人際連結來發動的困境，群眾可以針對議題進行參與，不再侷限於地理位置與時空。

胡元輝（2015）認為新媒體與傳播科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更重構了群眾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從三一八運動中可以發現，行動者運用新媒體繞過主流新聞媒體的中介，直接與大眾展開去中介的溝通，而群眾也可以透過新媒體與運動組織對話。胡元輝認為三一八運動是打造數位公地（digital commons）的展現，數位公地可以讓多元資訊可以互相傳播、讓不同聲音可以平等發聲。

過去，社運團體和主流媒體間存在不對等關係，社運團體必須依靠主流媒體傳遞資訊給群眾，卻又因無法控制主流媒體如何報導，而難以只依賴主流媒體（林靜伶，2014）。然而，隨著新媒體社運的發展，張錦華在〈從太陽花運動談新媒體、新公民、新民主〉一文中提到，新媒體的即時與大量資訊是超越傳統主流媒體的，主流媒體已經無法在第一時間掌握資訊的來源與內容，必須與新媒體合作，主流媒體也喪失詮釋與主導議題的獨享權，新媒體可以監督、批判主流媒體（張錦華，2015）。這也呼應了 Clay Shirky（2011）對網路世代的觀察，他認為「每個人都是媒體」，過去新聞專業把持於新聞媒體中，閱聽眾抱怨有新聞價值的事件報導得太少或缺乏，但隨著傳播媒體與溝通媒體的界線

模糊，閱聽眾也可以產製新聞，用來連絡與發聲的工具界線趨於模糊。

張錦華認為新媒體的特質也培力了個體四種公民性的展現，首先是被動的閱聽人轉變為自主公民，個體主動搜尋網路的大量資訊，甚至是自發性的協力，分享關心的議題給朋友、或製作懶人包等；從無知的民眾轉變為資訊公民，新媒體提供大量資訊與社群聯繫，讓個體可以進行公民參與；第三，冷漠的人民轉變為行動／協力公民，過去人們認為網民就是待在家裡的宅男宅女，但是透過新媒體的互動與培力，網民的主體轉化在一次次的社群聯繫、分享與協力中展現；最後是認同感的形成，個體在參與議題討論的過程中，會形成集體的認同。張錦華認為新媒體所培力的群體力量與在地意識的認同，讓新媒體社運改變的不只是某項運動的訴求，而是整體社會性與歷史質的改變（張錦華，2015）。

新媒體社運風起雲湧的的時刻，也意謂著人們更願意為了改變所處的生活而做出行動。Castells（2015）認為新媒體社運的發起有兩個關鍵的要素，首先是個體激發的情緒，個體對於社會規則、政治的不滿，會引起焦慮的反應，在與其他個體交流的過程分享感受，也可能因為某個重大議題的爆發，而讓個體焦慮的情緒上升至憤怒，憤怒又將激發出熱情，希冀將社會運動做為改變所處生活的方式。

而第二個關鍵要素則是通訊機制，交流越快、互動性越高，就越有可能促使集體行動的產生，過去的通訊機制仰賴口耳、書信、演講，而現代的科技產品與網路，加速了整個交流方式，也決定了組織的方式，互動性高、自主性高的通訊方式能讓組織層級越少，參與度越高，因而，Castells 認為新媒體社運是一種新型態的社會運動（Castells，2015）。

方興未艾的新媒體社會運動到底能帶來什麼？政治制度的改變？還是社會改革？也許在運動結束當下都還無法看見，但 Castells 認為，新媒體社運能帶來「民主」。人們透過本地與網路的互動而建立出自治空間，重建公共領域的運動，新媒體社運是人們共同行動並決策的實驗場，更是打造如何共同生活的可能（Castells，2015）。



小結：

當新媒體工具滲透進人們的生活中，人們對這些工具的使用變得熟悉，新媒體成為生活的一部份時，深刻的改變才會發生。「革命即意味著革命者的目標無法見容於現有的社會架構中」，或是革命者遭到壓迫，才會產生革命（Shirky，2011）。

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使用工具的革新讓傳統新聞媒體，面臨著改革轉型的課題，然而，另一群革命者，則是透過新媒體工具改變了集體運動的模式。本研究中的案例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也是透過新媒體進行集體行動，個體從串聯、發聲與集結都是透過新媒體，又以 facebook 為主，搭配其他的新媒體工具如：line、telegram、twitter 等為輔助。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帶來的不只是課綱議題的討論，運動中更讓社會大眾看見參與學生的主體性，由於這場運動，台灣社會甚至參與者本身才發現原來年輕學生也很有力量。

本研究將在參與者如何使用新媒體科技，以及新媒體如何影響他們的前提下，來分析參與者的主體轉化，並參考蔡秀芬與夏曉鵬研究中的三個主體化層次，從個體、社群再到歷史主體。然而，因前述的研究中未再細緻區分主體轉化的元素，因此將援引 Foucault 的「倫體主體」四面向來分析個體主體化。然而社會運動的發起並非易事，也無法依靠個體的力量，新媒體工具則排除掉了許多阻礙，個體從在網路上的「分享」、「合作」，再到「集體行動」（Clay Shirky，2011），這部份，將用以說明「組織串聯」的過程，而 Castells 的新媒體自主性則能用來詮釋「組織自主性」，最後以夏曉鵬研究新移民團體如何營造「組織認同」，來說明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參與學生如何打造社群主體。而運動過後，這群參與者是否改變台灣社會的歷史質，則將從「改造公眾的意識」以及「改造政府的作為」兩個層面來檢視。

研究問題：

本研究欲了解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中行動者的主體化過程，必須要知道參與者投入這場新媒體社運的動機，如何意識到自己的焦慮，並跨出一步，與他們所感知到的壓迫力量抗爭，並透過新媒體與其他個體串聯，最後進行集體行動。訪談問題涵蓋了個體、社群與歷史主體三個層面，欲了解參與者如何關心社會議題，從獲得資訊的管道到如何進行傳播，參與者又是如何決定投入社會運動，從個人到群體，如何打造對社群的認同感，再到運動結束後，運動是否達到目標以及對他們的改變。

因此，本研究列出以下問題：

1. 參與學生的主體化過程為何？如何從個人主體的轉變，如何擴及組織層面，以及後續帶來的社會影響。
2. 參與學生在運動過程中如何以新媒體突破社會對於高中、職學生的刻板印象，發展自我意識？

並根據研究問題列出訪綱：

1. 在學生身份上，你感受到反黑箱課綱微調的衝突與焦慮為何？
2. 說明參與運動的動機？過去是否曾有參與運動的經驗？
3. 請描述自己參與此運動的過程，做了哪些行動？
4. 希望透過抗爭達到什麼目的？
5. 在過程中，所屬組織進行哪些策略？在互動過程中，如何與群體進行合作？遇到不同聲音，如何因應？
6. 你認為這次運動對自我、親友與社會造成哪些改變？

第肆章、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訪談法（interviewing），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先根據研究蒐集資料，並按照研究問題與目的，設計訪綱，但在訪談過程不須按照大綱順序，可以視情況做彈性調整；並可以根據不同受訪者，

在引導式問題後進行開放的問題，讓受訪者在開放的情境中反思自己的經驗，也更能深入了解受訪者的個人經驗（潘淑滿，2003）。



本研究以滾雪球方式找尋受訪者，針對參與過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行動者進行約訪，並請他們介紹身邊曾參與過的人。訪談過程根據問題與參與程度深淺不一的參與者進行訪談，訪談問題也將根據受訪者的回答調整順序，並按照訪談狀況追問其他問題。訪談時間為 2016 年 1 月 18 日到 12 月 17 日，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間介於一至兩個小時，依據受訪者所居住的地區，分別與他們約在咖啡店、便利商店進行訪談。研究者分別訪談了十一位受訪者，受訪者年紀介於十七歲到二十歲之間，受訪者列表如表一所示。

在訪談期間，受訪者中有六名已是大學學生，兩名高中畢業正在重考大學，三名還是高中生。研究訪談對象有五名為北高盟成員，其餘六名則是非北高盟的參與者。由於參與者在運動過程中，都是高中、職學生的年紀，礙於年齡、經費與交通等因素，參與者無法長時間進行跨縣市的行動。參與者一開始在所屬縣市進行行動，然而，隨著微調的課綱正式上路的日期接近（2015 年 8 月 1 日），行動也隨著升溫，大型抗爭行動多選擇在教育部、立法院等政府機構前，而這也是本研究選擇北高盟做為訪談對象的理由。從 2015 年七月開始，大型的活動幾乎都是北高盟的成員所主導，北高盟因地域之故，方便在國家層級的政府機關前進行抗議，因而擁有較多的媒體報導，成為媒體與社會關注的焦點。而非北高盟的成員，除了舉辦所屬組織的活動，也會參與北高盟所舉辦的大型抗爭行動。北高盟的受訪者為立意抽樣，皆曾經是主要決策者，而非北高盟成員則是以滾雪球的方式找尋，透過關心課綱議題的高中教師與其他受訪者的推薦進行約訪。

表一：受訪者名單

代號	身份	組織	性別	是否有參與社會運動經驗	訪談地點
文琪	A 高中生	北高盟成員兼 A 高中	女	是	咖啡店(1hr)

		組織成員			2016/01/23
阿明	B 高中畢業生	北高盟成員	男	是	咖啡店(1hr) 2016/01/23
阿傑	C 高中畢業生	C 高中組織成員	男	否	咖啡店(1.5hr) 2016/01/23
阿貴	D 大學生	中途退出地區組織但仍參與運動	男	是	咖啡店(1.5hr) 2016/01/23
阿豐	E 高中生	E 高中組織成員	男	否	便利商店 (1hr) 2016/01/24
阿德	E 高中生	E 高中組織成員	男	否	便利商店 (1hr) 2016/01/24
阿水	F 大學生	高中組織成員	男	否	鬆餅店(1hr) 2016/01/18
阿土	G 大學生	高中組織成員	男	否	鬆餅店(1hr) 2016/01/18
小美	H 大學生	北高盟成員兼高中組織成員	女	是	咖啡店(2.5hr) 2016/12/13
阿正	I 大學生	北高盟成員	男	否	咖啡店(1.5hr) 2016/12/14
小花	J 大學生	北高盟成員兼高中組織成員	女	否	咖啡店(2hr) 2016/12/17

附註：(身份按照訪談當時羅列)

第五章、研究發現

此次訪談對象中，十一名受訪者的背景可以區分為北高盟成員與非北高盟

成員，但他們都有到台北抗議現場的經驗，而且在各自的學校、區域與全國都有不同的行動策略與參與。由於北高盟策劃過多次全國性的行動，因此，參與者是否為北高盟成員也將影響他們對於行動的感受。



受訪者中僅有一名擁有社會運動組織經驗，其他人都是首次進入社會運動的組織，但是在反黑箱課綱微調前，受訪者的運動經驗，又可以分為兩類：有一群人曾經參加過社會運動，可能是因為家人間會聊社會議題，讓他們對社會議題保持高度的敏感度，家人會鼓勵他們參與社會運動，甚至帶他們到現場。而另一群則是之前從未走上街頭，他們表示，在參與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前，並沒有真正迫切走上街頭的需求，關心社會議題可以透過看新聞，以及跟同儕、老師或家人討論就夠了。

本研究在整理訪談資料過程，注意到受訪者具有以上的類別特質，因此，在下面的研究發現中，也將說明各類別是否造成個人經驗上的差異。

一、個人主體的發展

(1). 倫理實體 (ethical substance)：個體的焦慮感受

倫理實體指的是感受的發生，也就是個體將自己打造為倫理主體的開端。這部分是與個人道德最為相關的，在李映昕的研究中把倫理實體定義為新聞 E 論壇的記者在三一八運動發生後，經驗到的感受，迫使這些記者以何種身分參與的原因。而在本研究中「倫理實體」則是指，參與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學生在課綱議題發生後，他們經驗的感受。這些參與的學生缺乏組織社會運動的經驗，是什麼因素使他們決定投入運動？在生活中是否有壓迫他們的力量？

1. 透過網路與學校得知課綱議題

在 2013 年馬英九執政下所通過的 104 課綱後，便有學者與民間團體出來抗議，認為課綱的調整在程序與內容都有所爭議。內容調整後，引起爭議的科目

有國文與社會科，部份高中教師曾在課堂上向學生說明，微調後的課綱將在 2015 年正式上路，因此，參與學生表示在課堂中曾聽過老師提及課綱微調。

我在 2014 年一月就知道課綱爭議，歷史老師上課有說，她很氣憤老師無法參加公聽會，主要是對程序的問題感到十分氣憤，但我那時還不知道歷史內容的爭議，..... 又過了一年，2015 年一月，我再次接觸到課綱議題，是參加北一女綠覺醒營隊，其中一天邀請了周婉窈老師來講課綱改了什麼，那時候才知道內容的部分。那時候教育部在公開資訊上被判違法，所以已經開始關心，就想說已經被判違法，大概到了五月底六月初，中一中先開始，（參與的學校）比我想像中多很多，每天都有，我們 A 中什麼時候要有，每間高中都開始這件事。

（受訪者文琪）

隨著外界抗議聲音變大，參與學生除了詢問學校老師課綱議題的發展，他們也會透過網路查詢更多有關課綱爭議的資料，像是曾參加過社會運動的小美就說，「以前有興趣的議題我會自己查資料，然後去現場看看」。未曾參與過社會運動的學生也是透過網路查詢相關資訊，並參與活動，希望更了解課綱議題。

那時候就想去認識一些人，有同樣想法的人，（透過 facebook 知道）會去演講場合，像是意見領袖、老師，所以我去參加哲學星期五或後門咖啡，這兩個是一開始去的，就有老師在那邊，學生也有一半，有認識一些人，後來還有台灣教授協會的講座。（受訪者阿正）

這些學生都善於使用網路，比起過去以紙本或電視來獲得新聞，或是要到圖書館查詢資料，他們現在大多直接上網查資料，並用社群平台來獲得新聞，像是阿正就說，他從國三開始就會固定用網路來收看新聞。

現在多用臉書看新聞，哪個跳出來按讚多，就會看，但也是會先看一下是哪家寫的，當然可能有些會有點奇怪，但不會因為這樣不看那家的，也會看一下底下的留言，去判斷一下，一些沒有邏輯或是立場相

反的我還是會看完。我現在就是看臉書朋友分享的新聞。我從國三之後再也沒看電視新聞，因為很浪費時間，我都改用電腦查。



2. 因困惑國族認同而產生興趣

在此次爭議微調的課綱中，為符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價值，因此在用字遣詞上做了許多調整，例如：「清朝」改為「清廷」，或是降低日本統治時期對台建設的描述，也刪除了二二八事件的舉例。這些學生認為，他們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課程內容與生活經驗是有差異的。參與學生認為身為台灣人，應該要多理解台灣的事物，但光是課本裡的國族認同就讓他們傷透腦筋。像阿明就表示，身為台灣人卻要花許多時間來背中國地名與中國的歷史，是讓他一直感到非常困惑的。阿水也表示，爭議微調的課綱裡去台灣化³的部份讓他不能接受。因此當他們發現課綱議題中的國族爭議，便引起他們的興趣，並思考課綱的重要性。

為什麼中國史的比例比台灣史多，中國地理教得比台灣詳細？剛好遇到了課綱爭議，就很有興趣去關注。（受訪者阿明）

公民把白色恐怖刪掉，我有看無法送達的遺書，所以我比較關注那塊，現在的政府想淡化那部分，所以是很不恰當不妥當的改變，想發出一點聲音。我認為課綱中的國族概念是錯誤的、是去脈絡的。（受訪者阿水）

3. 課綱議題切身相關卻缺乏社會關注

³於微調課綱中，馬英九政府提倡中國中心主義，排除台灣主體性。敘述臺灣文化時，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無條件強調台灣與中國之聯結，並認為台灣史附庸於中國史。先教授中國史，在無重要性的章節中附帶提及少部分的台灣歷史即可。稱呼上，盡可能消去提及台灣，而以中華民國代替。加入兩岸分治的內容，強調中華民國主權及於包含中國大陸的中國全境，否認兩岸為分立國家，強調一個中國立場。刪除與台灣獨立有關的內容，包括台灣地位未定論等不得教授。不提兩國論或一中一台，以一國兩區取代。針對中華民國政府在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作為，於公民課綱予以消去不提。

（出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BB%E8%87%BA%E7%81%A3%E5%8C%96>）

參與運動的學生都表示課綱議題與自己切身相關，在這裡沒有參與運動經驗與否的差異。關於課綱議題，參與學生表示他們從高中老師口中得知消息，也有人是一直關注教育議題，或是參與非營利組織或學校舉辦的營隊、座談得知黑箱課綱微調。在這裡學生們產生的疑惑是，課綱調整涉及自己的權益，卻沒有人在乎他們的想法；再者，高中公民教育教導他們行政機關要合乎程序正義，現在的課綱微調上顯然存在程序黑箱的爭議，導致教育的內容與實質生活脫軌。課綱爭議同時也讓一些早以對課程內容抱持疑惑的學生能深入去思考，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剛好這個議題跟自己可能比較相關一些，就會去查相關的資料，也會問老師問同學，發現這件事比想像的還要嚴重，發現也有其他高中的老師已經形成一個團體，已經抗議一年了，但我們卻不知道，就覺得很奇怪，這些抗議的人怎麼沒被社會知道，.....為什麼不會像太陽花學運或洪仲丘事件那樣被人看到？相較太陽花或洪仲丘，這是關係到你的小孩的事情，為什麼沒被大家關注，所以就覺得蠻重要。（受訪者小美）

4. 在課綱議題與家人產生政治立場的衝突—偏藍家庭

當參與學生開始關心課綱議題後，家庭政治立場偏藍的學生與家長開始有了意見分歧的情況。參與學生認為，家庭的政治色彩會左右他們對於政黨的偏好，以收看媒體的習慣為例，泛藍家庭習慣選擇立場偏藍的電視台、報紙，參與者從小跟著家人收看，無形中政治立場也會受到影響。

我的家庭蠻有特定立場，就是泛藍，.....最常看中天，雖然沒有一定要接受特定媒體資訊，但無意中就會選擇了它，我生活的區域就是這個樣子，雖然我不會說我支持國民黨，但我的確比較喜歡國民黨，從小就這樣。（受訪者小美）

當課綱議題發生後，主導微調課綱的正是執政中的國民黨，這些來自偏藍

家庭的學生感到納悶。未曾參與過社會運動的學生對課綱議題產生好奇，並主動上網查資料，他們內心所產生的衝突多來自高中時期接受的刺激，班上對於時事議題討論的氛圍、學科老師給予的啟發以及社群網路上的意見領袖，開始動搖學生過去服從家長規訓的認知。



我的家人我爸媽就是含淚投藍的那種，就算跟他們說國民黨做了什麼，他們還是會投國民黨.....但我們班（高中）很關心政治，在一般人眼裡，會像政治狂熱者，像在選舉期間，我們教室裡就貼滿「國民黨大敗」，老師也會跟我們討論，學校裡有老師加入歷史教師紮根聯盟。
（受訪者阿傑）

而曾參與過社會運動的小美則是在課綱議題前便對國民黨產生質疑。她在第一次參加社會運動前都受家人影響，而支持藍營政府，但當她身處社會運動現場，聽到群眾對國民黨政權的抗議聲浪，她開始產生疑惑，而在後續參加社運的過程中，才讓她更加了解反對國民黨的理由。

我 2013 年第一次參加社會運動，是洪仲丘事件，那時單純就覺得一個人死了，但上街頭才覺得很奇怪怎麼有人說反國民黨？我們不是在反國防部嗎？不是在反殺洪仲丘的人嗎？怎麼會反國民黨呢？怎麼會這樣？第二次是服貿，才稍微了解所謂的國民黨，為什麼那麼多年輕人討厭，為什麼要求泛藍要垮台，才了解國民黨是不好的，跟家人之間也開始有了一些衝突。（受訪者小美）

當參與學生的政治立場產生動搖後，與家人開始產生意見上的分歧，像是一起收看電視新聞的時候，他們會表達與家人不同的想法。而在課綱議題上，則會選擇持續跟立場相近的老師與同學討論。

5. 感受到社會不公義正在發生—偏綠家庭

而政治色彩偏綠的家庭對於社會運動採取較開放的態度，家長對於議題常

站在藍營的對立面。在參與學生的成長過程中，家庭成員也較常與他們談論社會議題，因此他們對於社會議題的敏感度較高。



我在三一八前就很關心社會議題，我家是本土家庭，我們家立場偏綠。我爸會講很多歷史給我聽，他參與過的社運歷史，他大學參加的是異議社團，所以我對野百合野草莓都不陌生。野草莓時有帶我去參加，從小會到各種抗爭場合，大中至正被拆時，我爸還帶我去看，那時我十歲，等於是埋下一顆種子吧。就連陳雲林來台，我爸也有到現場，他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事。（受訪者文琪）

當課綱議題發生後，偏綠家庭的家長不會阻止小孩參加運動，這些偏綠家庭的參與學生也表示因為他們感受到課綱議題是不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事。

他們（爸媽）立場偏綠，爸媽只是覺得蠻驕傲蠻開心的，所以也不會反對。……我是只要覺得不公平的事就會去做，那時候聽到覺得很督爛……，而且後來再談到黑箱就很敏感，台灣好像什麼事都在搞黑箱，所以聽到就有點敏感，在往內容去看，就很生氣。（受訪者小花）

6. 想突破學生的刻板印象

課綱調整的爭議並非只在馬英九執政期間發生，但是除了專家學者，社會大眾鮮少關注到課綱議題，接受教育的學生與第一線的教師是課綱調整後被影響最多的人，然而學生的意見卻經常被忽略。

台灣主流社會對於國小、國中與高中職學生的想像就是好好讀書，於是學生長達 12 年的時間往往在學校與補習班度過，升學主義掛帥的影響下，家長認為孩子在考試中的成績與日後人生的發展有著絕對的關係，學生們往往成為了考試機器。許多家長認為升學中的孩子最重要的便是考取好學校，課外活動、社團參與以及社交生活……等都可能是阻礙升學的因素，從家庭乃至學校再到社

會的氛圍，學生們往往被幼體化。當課綱議題發生後，沒有社會運動經驗的參與學生認為社會缺乏學生意見，他們對於學生身份開始產生反思。

我花比較多時間在自己有興趣的事情上，但其他高中生一直念書，被升學綁住，第八節下課後又補習，每天都很晚回家，沒有時間做其它事，好像就跟社會脫節了。我認為教改怎麼改好像都沒用，都還是只重視成績。（受訪者阿德）

而有社會運動經驗的參與學生則認為議題與自己相關，自然而然想去參與其中，但是面對反對的聲音，他們會更加抗拒。曾經支持文琪參與運動的家人，因為她花太多時間在反黑箱課綱微調上，而開始反對她參與，除了安全考量，家長更認為她不應該那麼深入運動，先以考上好大學為目標。其他參與學生到校外進行活動時，也曾遇到民眾叫他們好好念書。參與學生在這時的情緒更加焦慮，他們雖然不否認唸書重要，但也堅定的相信自己參與的價值。

我反黑箱課綱我爸媽都很反對我參加，她們覺得我要念書，我才高中.....，怎麼溝通，看當時他們質疑我什麼，我就回應什麼，說我沒念書，我就會說我念完才去，如果質疑我沒辦法改變什麼，我就說也許可以讓國民黨輸慘一點，而且我可以學到很多事。（受訪者文琪）

我們也有去新竹市區發傳單，有些人拿了就走，但有民眾會叫我們「好好念書」，不要做有的沒的，我會回他「我們會念書，但該做的還是要做」。（受訪者阿豐）

在課綱議題發生後，參與的學生因為課綱議題而產生生活經驗上的斷裂，開始反思家庭與其他外力（如學校、同儕、社會團體）的差異性，當他們認為課綱是必須去關心的事時，卻有許多因素讓他們疑惑，外界甚至出現反對他們的聲音，這讓他們產生想反抗的念頭。這也是鄭宇君在處理記者倫理焦慮時指出的，當個體遇到令他焦慮的倫理情境時，會開始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鄭宇君，2009）。



(2). 屈從模式 (the mode of subjectivation)：解決焦慮的方式

屈從模式指引發人們辨識出自己的道德義務的方式，像在李映昕的研究裡指的是 E 論壇的記者透過什麼方式，知道自己有義務去做報導，她認為屈從模式是被誘發的，個體對「被誘發」可能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受到環境影響而不自知（李映昕，2015）。因此，參與運動的學生是如何了解他們必須出來反對爭議課綱？他們為了解決自身焦慮，尋找什麼外力作為參考？之前發生的 318 學運啟發他們可以採取集體抗爭以促成社會改變的方式，而新媒體也是他們用來紓發焦慮的管道。

1. 採取社會抗爭的方式—以三一八占領立法院為參考對象

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發生於三一八運動一年後，參與學生表示他們對社會議題的關注是受到三一八運動的啟發，他們認為青年世代也很有力量，透過集體行動足以改變社會。

沒有社會運動經驗的參與學生認為三一八運動打開他們的眼睛，讓他們感受到社會上的許多不公義正在發生，而社會抗爭可以做為一個有效表達訴求的方式。

三一八的時候有一種把眼睛打開的感覺。這件事跟我們切身相關，可以發出一點聲音改變一點什麼，同學間也開始會討論相關議題，算從這個三一八運動開始吧。在這之前會關注社會議題，但三一八後，才發現原來群眾的力量很大。（受訪者阿水）

（我）想到三一八運動會令人印象深刻是因為占領，它是戲劇性的，會讓人印象深刻的占領行動，所以就想說是不是要這麼做。（受訪者小花）

而讓他們願意加入社會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台中一中的學生率先開了第一槍，在校內發起抗議黑箱課綱活動，他們才認為進行抗爭沒有這麼困難。

因為跟自己類似性質的人有行動，就會再去看一次，我去看過了這段時間又發生了什麼事，才比較了解，很誇張，有各種問題，同樣是學生，所以就去多看，才知道原來沒那麼困難，門檻降低了，有跟我類似的人也去做了。（受訪者阿正）

曾參與過社會運動的學生表示，他們過去就十分關注社會議題，因此當三一八運動發生時，便會在開始看不同團體製作的懶人包，上網蒐集資料了解運動的訴求，像阿明有到三一八運動現場靜坐，並且認為自己「是因為三一八而覺醒」。由這裡可以推論，參與者從前一年發生的三一八運動受到許多啟發並從中學習運動模式，三一八運動讓他們認為社會運動是改革社會與向政府表達訴求有效的方式。

我在 2014 年 1 月就知道課綱爭議，歷史老師上課有說，她很氣憤老師無法參加公聽會，主要是對程序的問題感到十分氣憤，但我那時還不知道歷史內容的爭議，那時還沒有三一八。但經過三一八後，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一些，我在想也許可以改變一些什麼。我的衝擊是在三一八的時候比較多，那時我去靜坐，就會思考，也會去看自己的同儕，我看到了很多問號，自己的同學到底在追求什麼？經過三一八後，我在想也許可以改變一些什麼。（受訪者文琪）

參與學生也提到，看到有人先出來行動了給予他們很大的勇氣，因為他們過去有想要進入社運圈，一直很希望透過社會來改變社會，這個時候剛好提供了適切的時間點讓他們進入運動場域。像阿明就說：「以前我有想過要進社運圈，但一直沒有契機。」

2. 用 facebook 進行發聲與串聯

身為數位原民的這一群參與學生，他們擅長使用新媒體，他們獲得資訊的方式就來自社群網路上的好友與意見領袖，收看新聞的方式也多以網路為主。當課綱議題發生後，解決他們焦慮的方式之一就是上網，他們除了上網了解課綱議題外，也會在 facebook 找尋相關活動參與，希望從這些活動解決他們的疑惑，或是認識更多有相同想法的夥伴。而參與學生也會在自己的 facebook 頁面上抒發對於課綱議題的看法。

我喜歡在自己的臉書上發表看法，去年是這樣.....，我很喜歡臉書。

(受訪者小美)

由於參與的學生缺乏組織運動經驗，他們很難找到其他想參與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群眾，因此，從擴散議題與人際串聯的角度，參與學生成立了 facebook 粉絲專頁，參與的學生便可以透過這些粉絲專頁找到彼此。

我們就透過臉書，可以跟其他區域的學生串聯在一起.....，我們一開始真的不知道要找誰一起合作，也不是每個學校的學生都會關注。學生也不像社運團體有很多人脈、資源與經驗，所以無從找起。(受訪者阿傑)

然而，參與學生使用個人 facebook 頁面做為發聲的管道有一項副作用，這也是他們在參與運動前沒有想到的。在運動過程中，記者與網友除了從組織的粉絲專頁得知活動訊息外，也會看參與者的個人 facebook 頁面。平常用來與朋友社交、抒發個人心情的管道，搖身一變成為個人媒體，他們的 po 文與任何舉動都會被放大檢視，意識到這點後，參與者在使用任何社群媒體發言都變得十分謹慎。

反課綱這時候發臉書文會非常謹慎，很多人在看，那時候會覺得文章寫得很好，反覆檢查很多次，因為覺得自己也代表反課綱。回歸個人時，就可以比較想講自己想說的，我覺得臉書是表達的媒介也算是媒體吧。當你身處一個身分，你表達的東西不會只是你自己。(受訪者小

美)

發言變得很謹慎，從我接發言人後就是。那時候不太會用臉書分享事情，想關臉書，到今年五六月都還有網友來亂留言，很想關掉臉書，沒有一個是我認識的。(受訪者小花)



在使用新媒體的部分，參與學生是否有社會運動經驗並沒有差異，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就非常習慣使用新媒體，因此當課綱議題發生後，無論是議題本身的疑惑或是找不到其他夥伴的焦慮感，都可以透過新媒體解決。而以社會抗爭作為達到訴求的方式，則是他們觀察三一八運動所得到的啟發。因此，參與學生可以透過新媒體進行自我實踐的第一步，便是自我發聲，以及尋找同伴。並且以社會抗爭作為達成訴求的方式。

(3). 自我實踐 (practice of self)：打造倫理主體的方式

自我實踐也就是自我技術，指自己為了達成倫理主體而進行的方式。在鄭宇君的研究中指出，自我實踐並非單一的過程，而是經過不斷反覆的嘗試，才能尋找到正確的做法（鄭宇君，2009）。

在本研究中，參與學生的自我實踐也是經過許多嘗試，由於參與學生在公共議題的實踐上可以分為「個人」與「組織」，在組織層面涉及社群主體的部分，將在下一節中有更多討論。

在自我實踐的部份，參與學生大多依循著一個模式：即焦慮的個體透過新媒體進行人際串聯，從班上同學、學校社團，找尋關心課綱議題的夥伴。參與學生通常先從校內先進行串連，與同學、學長姐等討論，取得共識後，進行實際行動，並將行動成果擴散出去。接下來參與的學生會與其他組織串連，並進行更多線下的行動，例如到國教署靜坐，以及衝進教育部。

1. 透過 Facebook 協力合作



在訪談過程中，當提及新媒體的使用時，受訪者皆認為是日常的一環，並無需特別學習，也沒有意識到自己要特別去使用，他們把成立粉絲專頁做宣傳視為理所當然的對外溝通管道。

反黑箱課綱運動的參與者多在校園裡進行人際作為單位，各個學校紛紛成立 facebook 粉絲團，到了 2015 年 6 月 4 號就有 204 個學校發起串聯⁴，不同學校的參與者彼此並不認識，但他們可以透過 facebook 連絡對方並快速串聯，互相「協力」，也會在 facebook 上互相分享活動跟資訊，讓議題的能見度變大。不同組織也會透過舉辦活動、講座，實際接觸不同學校的參與者。

我們先成立了蘋果樹的臉書粉絲專頁，在上面張貼相關訊息，直到五月底時，突然有許多學生關注，兩個禮拜內成立了數百個粉絲專頁，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瞬間跑出這麼多。五月下旬竹中、台北開始聯合宣傳，這應該也是帶動粉專崛起的原因，我們就透過臉書，可以跟其他區域的學生串聯在一起。學生的部分五月下旬才真正開始。（受訪者阿傑）

五月時開始跟北區的其他學校共享一些文件檔案，開始建立一些平台，.....，共享資料的部分是透過臉書上傳，私訊傳，會互相敲粉專，然後把人拉進一個很大的社團，大概兩三百人。（受訪者小花）

要讓議題熱度延續並升溫，勢必要讓組織擴大，因此，不同的學校組織開始串聯，並希望成為跨區、甚至是全台的串聯形式。

想把議題擴展開來，希望造成一些輿論壓力，後來就全台串聯，所以粉絲頁就出來，我們也有新聞，自由時報也有報導，有點聲勢出來，就想說見報後我們中期目標希望可以串連其他組織跟學校，跟新竹的

⁴ 公視節目有話好說統計，到了 2015 年 6 月 4 號，已有 204 所學校串聯，共同響應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有話好說：<http://talk.news.pts.org.tw/show/13930>）

其他高中合作，想要走出校園以及跨區的學校，串聯台北跟桃園，讓影響層面更大。（受訪者阿水）



而策畫多次全國行動的北高盟也在五月時成立粉絲專頁，北高盟的組成一開始是由阿正、小美與阿土共同討論，然而阿土因居住地區的緣故，後來未參與北高盟的決策。他們三人都來自不同的高中，在北高盟成立前都有不同的行動。阿正一開始就加入北高盟，而不是像小美與阿土都是先經營學校組織，他們透過 facebook 粉絲專頁連絡合作，阿正說一開始在想北高盟的名字時，遇到很大的問題，就是代表性，他們既無法代表全台灣的學生，也沒辦法不說明他們來自哪裡。

透過北區臉書，我找小花跟阿土一起管理，剛開始成立的時候是，後面有更多人，現在想想，那個名字超級難取，範圍很難界定啊，創粉專取名想很久，到底要抓多大的程度跟地域範圍，要感覺夠大又不能任意擅自代表別人可能會有人說憑什麼代表我們，代表性蠻有瑕疵，一定有疑義，我們也沒有要代表誰，只是集結在一起，但北區不會設限，只是一個概念。希望可以不要在乎名字啊名分啊，大家要加入就加入，能不有名字就不會有隔閡的感覺。所以後面我們都自稱學生，但我們也沒說自己是學生代表，只是沒辦法就會被這樣寫。（受訪者阿正）

而非北高盟的參與者也同樣面臨代表性的問題，在 facebook 上創立的粉絲專頁，都打著「某某高中反黑箱課綱微調」的名稱，受訪者表示，會參與運動除了此議題與自己切身相關外，還有基於對學校或是同校參與者有認同感，但是當這他們以學校學生的身分到學校外進行活動時，便會面臨不同的狀況，有同校師生會質疑這群學生的代表性，這個組織何以能代表全校師生的聲音？無論是學校組織的成員或是北高盟的成員，他們都認為自己沒有要代表學校或是整個北部地區，而是代表他們自己。然而，新聞媒體仍然會在參與者的頭銜打上北高盟代表、某某高中代表。

我也成立 B 高中的反黑箱課綱粉絲專頁，但後來學校主任叫我不能用學校名義來發表言論，所以就關閉了。（受訪者阿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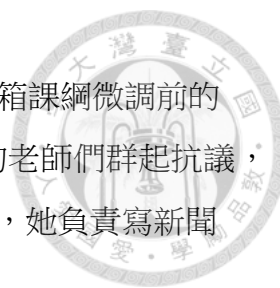


在中一中的臉書，也有學生會說為什麼我們這麼沒禮貌，還有說我們為什麼要用這種態度，不能好好講嗎？憑什麼代表中一中？我們看到這樣的留言都會一個一個去留言，好好回覆，我們也沒有說要代表台中一中，只說我們是台中一中的學生，但媒體就會這樣寫啊。在台中一中宣講也是會有人聽，但真正會停下來得非常少，所以我們都會附上我們粉絲專頁的連結或是 QR code。（受訪者阿傑）

2. 用 facebook 直接發布新聞稿與聲明

參與者從個人到組織的參與，都是希望能讓更多人關心課綱議題，他們希望先從校內師生開始，因此才會成立校園的組織以及粉絲專頁。一開始，參與者都注意到他們的集體行動容易被新聞媒體報導，甚至成為報紙頭條，他們認為可能是因為過去沒有這麼多高中職學生一起響應活動，所以容易吸引媒體關注度，然而，社會給予的迴響並不如他們所預期地大，因此後續的行動，更是希望能延續議題的熱度，讓全台灣的人知道課綱議題。

在新媒體的部分，參與者運用 facebook 做對外的發聲與組織串連，以 line 等其他通訊軟體聯繫聯盟成員。這些學生是擅用社群網路的世代，他們成立粉絲專頁後，互相分享不同組織的文章與活動，將新聞稿直接放上粉絲專頁，懶人包製作、照片與影片都難不倒他們，甚至將抗爭現場的影片放到粉絲專頁，無須透過新聞媒體，而是直接將現場狀況傳遞給每個關心的人。但除了新媒體的應用，他們了解新聞媒體仍是非常重要的傳播管道，因此在北高盟裡，就設有媒體聯絡人與媒體資源分配人，阿明說因為父母工作的緣故，讓他比較熟悉新聞媒體的操作，在運動初期，他選擇性的將採訪通知發給部分媒體，問及原因，他說因為剛開始操作，有些擔心，因此才將採訪通知先發給幾家對綱微調議題報導較中立友善的媒體，在 7 月 13 號的行動中，他們收到消息說有警力部屬，因此跟媒體說會在教育部前抗議，等快到了時後才改說在國教署，才不會被警方驅離。



另外像北高盟的小花是負責撰寫新聞稿與聲明稿，在反黑箱課綱微調前的幾個月，她就讀的學校發聲了校長遴選黑箱的事件，那時她的老師們群起抗議，學長姐也帶著他一起進行抗爭，當時，他們也成立的校園組織，她負責寫新聞稿與聲明稿。

新聞稿跟聲明稿，新聞稿就是清楚簡單，把訴求講明白，聲明稿可以有情感訴求，而且我是受教主體、我是未成年、我是小孩子，用高中生的身份來說話，會有比較感性的字句出來。我有先寫過反校長的，才知道新聞稿不能寫太長。也有一點心態蠻不好的，就是我給你什麼你就要報。而且決策圈內，阿明家裡有媒體(背景)，所以他也有給一些建議。(受訪者小花)

然而，在即時新聞滿天飛，各家媒體比誰的新聞快的情況下，未經求證或是斷章取義的新聞層出不窮。參與者才發現，原來錯誤的新聞內容真的有人會相信，這樣的錯誤報導可能模糊運動的焦點，因此，他們會透過 facebook 來發布聲明或是以個人管道來澄清。

有一次是蔡正元截我的圖，說我對教育部長沒禮貌。是去國家圖書館跟教育部長面對面座談，我旁邊的同學不想跟他(教育部長)握手，有跟他表達，我當時剛好轉頭，他就截掉那個同學，顯示出是部長要跟我握手，我轉頭不要，抹黑我.....。感謝廣大網友找出原圖幫我說明，蔡正元不知道從哪截的，那天好像是要退場吧，就有很多記者一直打給我，朋友也問我要不要回應，我就轉了他的文吐槽他你這樣改圖我才覺得好笑，但記者有轉(我的文)。以前扮演閱聽人的角色，不會是當事者。很多時候會覺得媒體講的可信不可信，但當親身經歷，才知道這沒辦法控制欸。(受訪者小美)

3. 在校內舉辦活動 讓校內師生了解課綱議題

參與學生接觸課綱議題的管道多來自學校，因此他們多從校內開始舉辦活動，希望先讓校內的師生一起關心課綱議題。阿傑表示縱使他就讀的 C 高中風氣自由，但他們班上的氛圍與其他班級不同，班上常常被看成「政治狂熱份子」，勇於表達對社會議題的看法，甚至會在班上高掛布條，這樣的班級，在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上便有過半數的人參與。阿正也在內學校走廊舉辦短講，而文琪與阿豐也分別表示他們在 A 高中與 E 高中透過社團程序申請活動，宣導課綱爭議。參與的學生會與校內同學互相討論並且一起規畫行動。

我們一開始就做了一個懶人包，兩張圖片一張講程序一張講內容，在校內貼文宣，發傳單，也跟學生會一起合作，用學生會的場地每個中午宣傳連署，一個多禮拜後收到五百多個簽名。(受訪者文琪)

(中一中活動發生)當天晚上我就馬上 line 朋友，我們來搞一個大的，學崇倫他們辦一場活動。我們也都是蠻關心社會議題的人，所以就開始找人，問願不願意關心這件事，不一定要抗議，而是在學校辦一場活動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所以大家就說好，創了一個「反黑箱課綱 XX 高中站出來」還有「XX 高中反黑箱課綱學生陣線」。我們印製講義(整理好課綱的內容)、海報宣傳、上台演講解釋。有一百多個學生來，很多老師也有來，就講為什麼我們要反課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有那麼多老師出來，不管支持或反對，請大家一起關注這件事。(受訪者小美)

參與的學生除了希望校內有更多人關心課綱議題外，也希望他們的學校不要採用爭議課綱，這樣才能符合公平正義。像 E 高中社團就先將有興趣的成員加進 line 群組，他們在校內進行連署活動，向校內同學講解連署內容，也針對校內的老師進行遊說，希望老師採用舊版課本，不要使用新版課本⁵。

我們用兩種說法來說服老師，一個是老師不能只關心自己的教學。另

⁵ 高中課綱微調引爭議，教育部長吳思華表示，教育部完全尊重各校教師自主選書或自編教材，不會有行政干預，學校要用舊版教科書，教育部也予以尊重。
(中央通訊社：<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6010282-1.aspx>)

一個是這些老師都教我們程序正義、民主的重要性，實際上現在課綱違反程序正義，黑箱，你課本講的跟實際做的不一樣，這樣不對吧。
(受訪者阿土)



4. 遇到反對力量時 採取協商作法

當參與學生遇到反對力量時，多想辦法溝通，也會以妥協的方式爭取繼續參與運動。像有些學校明顯反對學生參與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就連詢學校正規管道申請活動，都會被師長阻止。阿明就表示他就讀的 B 高中校長跟他們說「讀書就好」，阿明的學校主任也表示反對，「我也成立 B 高中的反黑箱課綱粉絲專頁，但後來學校主任叫我不能用學校名義來發表言論，所以就關閉了。」

抗議行動在學校是很容易被貼標籤的，被老師、教官校長記警告怎樣的，.....但這（申請活動）直接上到主任那，然後就一直被主任找去飆罵，一直被罵，.....說為什麼要搞這種東西，你們要搞就去教育部搞啊，我就讓你去教育部抗議，我當時想說好啊，但也很挫敗，他邊幫我蓋章邊這樣講，弄到教育部這件事是很困難的，我們就只是一個學校，了不起加上中一中，但很困難。那時校長不太支持我們的活動，他覺得很敏感，會影響同學，沒有吵架，只是很認真的溝通，他就說「白色恐怖這個詞每個人看它的意思都不同」，講稿也有附給他，所以後來說白色恐怖要去掉，講稿不能提到這個，很莫名其妙，後來有再做第二次約談，要我們承諾影片照片都不能放到網路上，我們也只好答應他。後來隔天有媒體來詢問我，我就有告訴他們，就有上網路新聞，校長說講稿要去掉白色恐怖。(受訪者小美)

當遇到家人的反對，參與學生表示他們都會嘗試跟家人溝通，像阿正面對立場保守的爸爸，就會用較柔軟的態度來說服他，「我爸爸跟爺爺都是榮民，.....爸爸會覺得我被騙了，我會跟他們講，我想試試看，這種東西沒辦法講得太死，太強硬，所以我會說讓我試試看。」

我的家人一直都很反對，說為什麼放假都不回家，父母比較封閉保守，

政治色彩偏藍，像我媽看到馬習會有人抗議，就說台灣就是太民主。我小時候跟媽媽感情很好，跟爸爸超不好，長大後反而跟爸爸較能溝通，他願意跟我談，我媽超反對到聽不下我在講什麼，但是他會聽我說，我們會討論，有一次還來聽我們演講，上大學後也常打電話聊天，在這次事件後，我才發現跟爸爸比較能溝通，關係就變好。(受訪者阿土)

5. 占領實體空間 衝進教育部

Castells 指出，近年的新媒體社運都具有有一個特質，即實體公共空間的佔領 (洪貞玲, 2015)。在三一八運動中，可以看到的是參與群眾佔領立法院，而在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中，參與學生認為，他們學習三一八運動的模式進行社會抗爭，所以他們理所當然會想到以「占領」來做為抗爭方式。

突然想到 318 會令人印象深刻是因為占領，戲劇性的，會讓人印象深刻的占領行動，所以就想說是不是要這麼做。(受訪者小花)

北高盟的參與學生表示，他們在先前做了許多溫和的活動，例如：在教育部前射紙飛機以及遊行，在 7 月 13 日他們到國教署靜坐抗議時，意外推倒鐵門，進入國教署內部靜坐抗議。然而，這些活動過後，學生們還是無法得到教育部更進一步的回應。因此他們決定發起包圍教育部行動，在 7 月 22 日晚上包圍教育部並夜宿。教育部雖派人前往關心，但並未回應學生對於課綱的訴求，同時，教育部在全台各地舉辦的座談會中，不僅前教育部長吳思華並未出席，與會官員也未具體回應學生意見。在這樣的情況下，參與學生決定升級行動，占領教育部。

這段期間為了維持議題的熱度，我們都持續投稿、短講。到了 7 月 22 日原本就有想衝教育部的想法，但是沒有正當性，因為教育部不回應，我們才有理由，有憤怒點，才能衝進去。(受訪者文琪)

然而，面對衝進教育部的作法，參與學生也抱著矛盾的心情，他們認為這涉及違法行為，可能面臨被捕的風險。部分參與學生坦言，參與運動前便跟家人約法三章，絕不進行違法活動。然而，抗爭進行到當時，他們已無計可施，因此，部分學生選擇不進入教育部，留在外圍聲援。



他們（指父母）純粹擔心我，擔心我有前科，擔心我被抓去關，所以約定我不能違法，阿正也是，只要我們做出違法的事，我們就不能再參與。23號衝進教育部時，我在外面，但新聞一報出來，我爸就馬上打給我，很強硬要我回家，但我又不能放下組織，一回家就一直哭看直播。隔天一早就去看大家，他們說裡面很可怕，我們在衝之前說，我們會面臨什麼刑法，有評估過，但想像中的你可以，跟現實上還是有落差。他們說裡面一片黑，又不能自由行動，警察卡卡卡踩在地面的聲音，旁邊又有像瘋子的人，真的很可怕，當有第一個人開始哭，情緒就會崩潰。（受訪者小花）

衝進教育部的參與學生連同三名記者與民眾在 23 日凌晨被警方逮捕，並帶回警察拘留審問。教育部發表聲明譴責學生違法並堅持提告。同時，民間團體、學者與律師出面聲援被拘捕的學生和記者，批評教育部以及警方違反新聞自由。

我第一次被抓進警局，甚至到北檢，我就覺得這不是人待的地方。是非常恐懼的，連續照射十個小時的強光，有人隨時監督著你，等於是自由與隱私都被完全的剝奪，是環境與場合的壓力造成這種恐怖的感覺。第一次是抗議馬英九，第二次衝教育部被抓。（受訪者阿貴）

小結：

這些參與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學生們大多是社會運動的素人，他們並沒有長期關心某個議題，也不是來自同一個社團組織，對組織運動也十分生疏，卻能在短時間內透過網路互相協力、串聯，共同反對爭議課綱上路。

這樣成功發生抗爭運動的原因在於，參與的學生身處於新媒體工具便利的時代，新媒體不僅僅是工具，更培力了學生的公民特性，他們主動查詢資料、分享議題並合作，讓他們達到公民參與。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學生生長在民主的世代，他們從小便不斷被教育民主法治的概念，因而願意挺身而出，反對違反程序正義的行政機關，就如同受訪者文琪所說「畢竟我們是「天然獨」的世代。」

然而，雖然這些學生生長在一個十分開放自由的時代，然而，在他們自我實踐的過程中，也面臨了許多衝突與矛盾，他們必須採取溝通與協調的方式來面對家庭與外界的反對力量；當他們面對衝入教育部占領行政機關的決策，則讓他們擔心違法的可能性，當他們準備好不同的方式面臨衝入教育部的後果，像是被拘捕，現實狀況也不如他們原本想像地容易。在他們打造自己成為倫理主體的過程中，也是遭遇了許多的考驗與阻礙。

(4). 倫理目的 (teleology)

倫理目的指當人們從事道德行為時，人們渴望成為的存在是什麼？李映昕也認為是人們賦予自己道德規範時，希望達成什麼目標（李映昕，2015），也就是這些參與者他們的目標為何？在課綱議題發生後，參與運動的學生希望自己成為怎樣的的存在？

1. 讓社會正視學生的聲音

參與者加入運動的原因，都是基於對教育本質產生了疑惑，在我國的教育改革上，充斥著專家學者、政府官員與家長的對話，卻忽略了教育主體是誰，學生的聲音缺席。參與的學生認為課綱調整似乎只是按照執政黨的邏輯來走，換了執政黨就調整課綱，學生到底需要什麼？鮮有人在乎，剩下的好像只有考試成績。

我在三一八運動過後的暑假的時候出國，看看美國的教育方式，我蠻

認同他們的開放式教學，尤其在歷史跟語言最明顯，像國文不是用背的，而是讓學生開放式的思考，老師引導學生，讓他們發言，學生成為課堂的主體，而不是老師。（受訪者文琪）



教改的失敗來自父母，因為話語權都在大人身上，是大人想要什麼，而不是孩子要什麼，大人不問他們要什麼，而是我要讓你們知道什麼，就像課綱議題阿，學生說我不要微調，大人只會說這不是壞東西，我們怎麼會對你們不好。家長只看到升學的虛榮感，回歸教育的本質，教育到底是什麼？目前看起來就只有好成績跟壞成績。（受訪者阿貴）

2. 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這些參與的學生都認為身處在民主法治的國家，無論個人還是行政機關都應該遵守法律規範。

這是很明顯有心去做的，這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九五課綱九八課綱都是，藉由政黨輪替，就斷掉，課綱就突然被砍，有政治的介入，而且以前就一直這樣，但現在強調民主強調法律的時代，既然我們這個驕傲是一個民主進步國家怎麼還用這種手段做這樣的事，很明顯是政治在操縱課綱。（受訪者小美）

過去未曾參與過社會運動，甚至對社會議題較冷感的小花表示，她雖然不太關心社會議題，但她認為課綱議題「就是一個不公平的事」。

特別會讓我想參與真的是因為關注很多事後，發現長久下來是不公不義的，很多事我們都沒有出聲，或是沒有做些實質的事。而這直接影響高中生，這個議題我是直接的受害者。（受訪者阿正）

因此，參與的學生希望課綱的制定能符合程序正義。在高中職階段，學校教導他們行政機關要符合程序，然而，眼前就有一件不符合程序的事正在發生，

因此他們認為自己參與運動，可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這些老師都教我們程序正義、民主的重要性，實際上現在課綱違反程序正義，黑箱，你課本講的跟實際做的不一樣，這樣不對吧。（受訪者阿土）

不是本身覺得社會和政府太可怕，而是它就是這樣，所以我才要抗爭。
（受訪者阿正）

小結：在課綱議題發生後，參與的學生因家庭政治色彩產生的衝突、國族認同的困惑等原因，開始產生焦慮的情緒，他們從焦慮的感受進而反思，並試圖與反對他們的聲音溝通。學生做為受教主體，他們的聲音卻被忽略；學生身處於民主法治的國家，行政機關卻公然違反公平正義進行黑箱作業。在這一連串的主體化過程中，參與的學生希望他們的主體性被看見，更希望自己是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公民。

二、自我主體到社群主體

本研究在社群主體的部分提出「組織的串聯」、「組織的自主性」、以及「組織的認同」三個部份。Touraine 認為如何從個人主體上升到社群，打造出社群主體，必須讓個體間連結後，將形成為組織，並透過組織進行集體行動（Touraine，2000）。Clay Shirky（2011）認為網路組織的成員會透過線上的分享、合作進行集體行動，此部份可以說明「組織的串聯」。而「組織的自主性」則以 Castells 對於新媒體社運的觀察來詮釋，他發現個體具有的自主性，也將在組織中呈現（林靜伶，2014）。然而在組織行動前，組織內的成員必須先經過溝通協調，才能達到共識。夏曉鵬（2006）也表示必須要解決組織內的溝通與衝突，才能建立社群認同感，有了社群認同才能打造社群主體。因此，以下將說明參與學生的個人主體如何營造社群主體？

（一）、組織串聯



組織串聯指的是新媒體社運的參與者如何透過線上的分享、合作進行集體行動 (Shirky, 2011)。然而, Castells (2015) 觀察到近年新媒體社運中, 不只具有線上的串聯, 也具有線下的行動, 而在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中, 也具有此一特質, 透過線上與線下的進行, 社會運動才能更有效的達成訴求。

1. 線上分享合作

五月到六月各個學校陸續有所行動, 各自以學校為名的反黑箱課綱微調 facebook 粉絲專頁來進行發聲, 參與者製作懶人包、放上活動訊息以及活動成果, 希望讓校內的師生都能一起關注課綱議題。與此同時, 他們也開始跨學校進行聯繫, 希望集結地區性學校的人力與資源, 可以對學校、教育部造成更大的壓力。受訪者表示原本與其他學校的人並不認識, 但透過粉絲專頁, 很容易找到他校的行動者。而不同的粉絲專頁也會互相分享活動訊息, 而非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粉絲專頁也會基於可能是同學校、或是有類似立場而轉發訊息。

我們也有開臉書活動專頁, 讓更多同學可以知道這件事, 臉書上有很多什麼告白中和黑特中和跟表特中和, 三個小編也都很熱心幫忙宣傳, 我們自己也是有宣傳, 結束活動後, 我們又開了一個專頁, 中和高中反課綱的, 全台灣都有那時候都有。(我們) 主要在經營專頁時, 希望學校內外的人都可以看到, 越來越多人看越好, 會關心會按這個專頁讚的, 可能大多是中和高中的, 但也是希望外面的人看的到, 但當然會希望學校先都知道課綱議題。(受訪者小美)

2. 線下參與互動

參與者在運動初期會希望先凝聚校內的聲音, 提高校內對於課綱議題的認識, 因此在學校當中會舉辦座談, 邀請專家學者與會, 到各個班級進行連署、以及說服校內被微調的科目的教師, 希望能拒絕使用新版課綱教材。受訪者表示, 因為六月是期末考, 儘管五月初受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的影響, 而陸續有

所行動，卻礙於期末考，沒辦法使行動升溫，有些感興趣的同學也會表示要先考完期末考才能投入。但透過舉辦實際活動，更能夠鞏固組織內部成員的感情。

我們分別於 6/4、9、11 舉辦三場講座，請老師們針對課綱議題來演講。三場都有 60-70 人來參加，但並非全都是高中生，我們在這幾場演講中，漸漸也有固定的組織成員，大概十個左右，當時就慢慢建立起一些人際網絡。（受訪者阿水）

從線上的討論，到線下的串聯，不同組織的參與者能快速地找到彼此並聯合起來擴大行動。例如，桃竹苗高校聯盟從七月就開始討論擴大行動，八月初就分工打給立委參選人，詢問他們是否對於反黑箱課綱微調議題的意見，希望讓議題的能見度繼續擴散。多所學校組織的參與者也加入北高盟，於六月進行第一次的聯合行動「第八節突襲」，參與者到不同學校門口進行宣傳。

第八節活動是從學生自主發起的，希望持續引起注意並讓大家關心這個議題，但重點是讓高中生關心。會有各種反應，被罵啊，被教官趕，有同學被黑特，有同學也會留下來說謝謝或加入，各種都有（正面跟負面都有）。一定會想跟他們對話，但可能無法一個一個回覆，會蒐集後一起發一篇文（到粉絲專頁），不然很累，但現場有機會就個別講，拿著一個牌子就講，大家各自都有宣傳跟對話。（受訪者阿正）

新媒體的快速連結，讓參與學生在網路上可以迅速找到夥伴，並互相分享對議題的看法與活動消息，更能彼此合作，共享資料。線上各個組織的串聯是平行的，在短短時間內搭起橋梁。而線下的行動也很早就出現了，各地的學生自主發起校內外的活動，並透過網路串聯讓更多人到場參與，線下行動也在全台灣遍地開花。然而，參與者與組織之間需要相互合作，但也有各自目標，因此也可能產生分歧，所以必須依靠溝通協調，才能進行行動。

（二）、組織自主性

在自主性的層次上，林靜伶（2014）認為有個人與組織的差異，以個人來說，就是有自我判斷的能力，而在組織的部份，則是當個體透過網路，找到志同道合者連結成群體時，將建構出群體的自主性。然而，個體間是具有許多差異的，因此，在組織中當每個人都要維持自主性，將無法達成共識；在組織中必須要溝通妥協，才能形成共識。在本節中，將探討參與學生們如何維持自主性？當政黨或是資深社運團體希望給予協助時，參與的學生會如何因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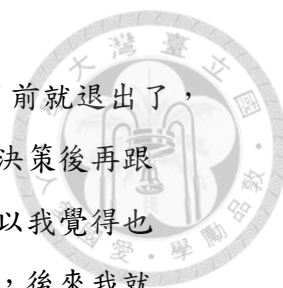
1. 學生主體被質疑

當這些參與者決定要有所行動時，是帶著非常清楚的目標和想法前進。由於高中生參與運動並非容易的事，不管在課業、生活時間以及金錢上都有許多限制，他們大可以關心社會議題，在議題外圍旁觀，無須突破學校、家庭乃至社會給予的重重限制，但他們選擇加入這場戰局。除了群起的憤怒外，還是深思熟慮過的。有人以廢止黑箱課綱為目的，但也有人是帶著教育改革的理念來從事此運動，不管在目標或是手段上都會有落差。然而，這些參與者的主體性卻被質疑，社會大眾，甚至是他們的家人會認為參與者被政黨蒙騙。

（我）會覺得學生被幼體化，我自己觀察，學生比較不會外被界說我們意圖不好，不會被指責意圖，大多說是被影響被操控，沒有主體性，我們不是自己思考的，像是錢誘惑啊或是社會誘惑，要我們滾回學校，是對我們的身份開槍而非說話內容。（受訪者阿正）

2. 與政黨和利益團體保持距離

維持組織的高度自主性是參與者的共識。無論是組織內外，參與學生都表示應該維持本身的自主性。在學生組織的部分，不同組織之間會一起舉辦活動，或是用網路分享等方式來響應並合作，在過程中不會刻意影響彼此的決策，參與學生表示他們都希望能維持各自的自主性，彼此友好、合作，但並非互相干預。而在同一個組織內部，組織成員會透過溝通來解決不同意見，或是以投票的方式表決，然而當成員遇見一方無法妥協時，則異議方可能會選擇離開組織。



我本來有加入桃校高中聯盟，我是決策組組長，但在七月前就退出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對組織的想法不同，像我就認為應該先決策後再跟大家說，這樣效率比較好，但其他人認為要一起討論，所以我覺得也要尊重其他人，應該讓他們去做，而不是影響他們的決定，後來我就以個人的身分與其他組織合作，但不是加入，跟北區、桃區、南一中、中一中蘋果樹等組織都有合作。（受訪者阿貴）

在組織之間也存在著是否具備社運經驗的差異，部分學生組織中，因具有較多曾參與過社運的成員，因而對其他學生組織產生反感，認為他們沒有經驗。

像北高合併前，北高、北職鬥爭嚴重，北職還笑北高是高知識阿米巴原蟲，說高中生只會讀書、論述，不像他們有好幾個人都有社運經驗。（受訪者阿豐）

而在組織與外部團體的互動部分，資深社運團體，如：台左維新、公民監督聯盟、民鬥、人本教育基金會等，都曾經協助過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組織，提供運動現場的物資援助、社運經驗分享與法律諮詢等幫助。也有民間團體及商家主動提供食物給在抗議現場的群眾。

人本教育基金會提供我們很多法律和教育上的知識，台左維新跟民鬥提供現場的支援，公投盟則是實際的物資，像是水、油壓剪等。（受訪者阿明）

在聯繫上，很多學生跟組織會主動找上我，討論如何進行，我也會給予人力跟媒體的支援，或是有些社運團體想協助學生，也會找上我，我就像是媒人，一個橋樑。我有個群組，裡面都是關注社會議題的夥伴，大概六十幾個人，我就會問裡面有誰可以幫忙，分組的組長就會回報他們那組可以出幾人力，都是自願性的，有些也會回說可以出布幕等物資，像這間咖啡店的老闆也找我說他想贊助學生咖啡，我覺得

就是把資源釋放出去吧，社運資源本來就不多，就要互相幫忙。（受訪者阿貴）

面對這些外界的協助，參與學生表示，他們理解前來幫忙的團體是與他們理念相近的，但也會擔心他們可能會過度干預或下指導棋，將失去組織本身的自主性。這些資深社運組織與學生組織也存在運動經驗的差異，社運團體認為自己組織過運動，他們希望用先前的經驗告訴參與學生們怎麼做比較好，然而，卻可能變成批評或干預，像阿明就談到，某些資深的社運團體曾對某幾次活動感到不滿，認為他們缺乏社運經驗。

一些 NGO 就批評說你們運動怎麼做成這樣子，所以一開始我對這些 NGO 有些意見，後來他們也認為，我們不該拿以前的經驗對學生下指導棋，我才對他們改觀。（受訪者阿明）

有時候規劃的沒那麼完善，有些懂的人，從事過相關的人，會用嘲笑的方式，哈哈怎麼會用這種方式，沒有處理好啊哈哈，發個文嘲諷，就會有點難過。（受訪者阿正）

面對外界給予的協助或建議，運動組織會開會討論，也會接受 NGO、社運團體的支援，但還是選擇與他們保持距離。跟政治人物之間則採取不合作的狀態，因為他們擔心被扣上政黨色彩，而讓運動失去焦點。

我們跟其他社運組織連結的方式是互相討論，給意見或是物資，像是音響麥克風，合辦講座，但活動還是學生主導，大家都很重視組織的主體性。這些組織都沒有加入學生團體，只是保持友好，但不合作，重視學生主體性外，我們不希望有政黨或 318（運動）的人加入，不然就會被（外界）指控說被哪個團體操控。（受訪者阿傑）

學生力量蠻薄弱的，沒有資金也沒有物資，有很多不同熱心的團體幫忙，也有民眾會幫忙、捐款，也有比較有組織經驗的人提供建議，也

會提供物資像是大聲公啦。畢竟社會議題比較敏感，也是會有 NGO 組織想影響，但這是學生活動，所以決策還是在我們，當然我們不懂的部分可以請教他們，我想主動權跟主導權還是在我們這邊。(受訪者小美)



3. 打造具有高中生色彩的運動

由於參與的學生並非有經驗的社運人士，他們覺得這場運動是要爭取自己、學弟妹的權利，因此，他們自然而然的是從學生的角度出發去思考。像北高盟面對外界質疑他們的主體性，認為他們年紀小一定是被牽著鼻子走時，更認為要走出與先前的社運不同的路，這場運動要具有鮮明的高中學生特色。

所謂不一樣的社運是，一來我們很怕跟民進黨扯上關係，很怕被說我們是民進黨的人，所以也怕接受其他人的幫助；也怕太老練的話，失去高中生的樣子，好像只是一群魁儡，別人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我認為)最後的衝撞都不是高中生該有的，高中生該有的抗爭樣子很像一開始五六月那樣，或是七月五號的大遊行也蠻好的，射紙飛機也是，七月十號以後就有點不像了。(受訪者小花)

在運動過程中，參與學生們都透過經營組織建立主體，無論是面對外部的質疑或是協助，參與學生們會去思考，什麼是他們需要的？透過解決組織內外的衝突，他們打造出屬於高校學生色彩的運動。

(三)、組織認同

組織認同則指凝聚共同的社群感，夏曉鶯(2006)認為社群主體來自對社群的認同，而社群感建立在組織內部的衝突與溝通上。然而，參與運動的學生組織不只要解決組織內部的意見分歧，還有來自組織外部的批評，在本節中將說明參與的學生如何克服這些問題。

1. 尊重不同意見 學習多數決

不同組織的參與者都提到，在組織內大家的意見很多，因此需要花許多時間成本在溝通，但大家都意識到，一個人力量很小，要透過組織行動，就必須要互相協調出一個中間方法，才能使行動效果擴大。



從開公聽會暫緩到撤銷，我們的主張是一直變動的，因為成員很多，主張也都不同。（內部）開始出現不同意見，有溫和派希望開記者會，有激進派希望衝總統府，當然這馬上被我們否決，大家花了很多時間成本在討論。……有人認為要廢止（課綱），有人談程序（正義），有人談史觀……，但要跟他（教育部）談歷史詮釋跟史觀很難討論出結果，孰優孰劣很難說，所以大家有共識說程序……，這樣的訴求也是有很多紛爭，就是透過不斷開會、吵架、和好、討論再嘗試說明，最後目標就是暫緩課綱的施行。（受訪者阿傑）

以北高盟來說，因為組織又更加龐大，一開始他們透過線上投票來做決策，後來因行動變多，也隨著學期的結束，成員可以實際出來開會討論。一開始同樣透過舉手表決的方式，然而，當需決策的事變多，好像所有時間都花在表決上，因此決定選出六人決策圈，以及不同的工作小組。重大議題同樣經由所有人投票決定，而小議題則讓決策圈先統整討論。

組織的意見協調一開始採多數決，沒有決策小組，但後來有了決策小組後，決策圈外的人就不滿，所以改成分組，把每一組的意見往上傳再決定。（受訪者阿明）

看事情投，如果是大事，是所有人投，但如果很瑣碎，就我們幾個投，一開始人數多就在臉書投票，後來頻繁開會就面對面投票，因為有很多事要做決定，初期都比較多人，組織就是有人會慢慢消失，所以後來有變少，但有投票的事就盡量都大家投，後來也有選出不同活動的決策人員，希望可以用最民主的方式去做活動組織，我們都是學生，

很多事也不太懂，不希望都是同一組人來處理，但到後來會發現大家有各自擅長的部分，像是媒體聯絡、物資、維安、決策，我也有待過媒體那組，也有維安，很彈性，也可以換。(受訪者小美)



2. 虛心接納來自組織外部的批評

當社會抗爭的進行過程中，衝突未必只來自組織中的成員。代表各學校的反黑箱課綱微調組織容易遭遇來自同校師生的攻擊與質疑，比起大多數同學的漠不關心，少數人會匿名在 facebook 的黑特 XX 高中上發文，質疑組織為何可以代表全校意見。而網友同樣會給予意見和批評，參與者會將網友的回饋蒐集整理，並在組織內部開會時提出討論，也會視情況接納網友意見，並改變活動的方式。

我記得有一個活動，好像是 7 月 22 日的行動，在討論要不要穿制服，後來有公布活動要穿制服，但網民砲轟，制服是權威，你們反權威怎麼還穿制服。當下蠻錯愕的，但要是有意識到說做錯了，不能很倔降不能有太驕傲的想法，所以就改掉，也有上網說明。(受訪者小美)

小結：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來自於一群學生在網路上快速的分享和合作，然而，當這些擁有差異性的個體集結在一起，並試圖以集體行動的方式來達成訴求時，便會產生衝突。無論是北高盟或是其他組織，都清楚理解組織的定位，並保持自主性，不與政治力量產生連結。參與學生在組織中以民主的方式進行決策，開會討論、投票表決，尊重個體的差異，也達到了決策。當他們面對外界的質疑他們選擇聆聽，接納不同意見並改變活動內容。在維持自主性與溝通妥協後營造出社群認同，因而產生社群主體性。

這場三個月的抗爭運動，可能跟參與學生原本想的不一樣。參與者原本興奮的進行校內外的宣講活動，進行「第八節突襲」，共同舉辦全國性活動，像是到教育部遊行與在國教署前抗議。他們沒有想到必須在七月下旬升級行動，夜宿教育部前，有一部份參與者衝進教育部因而被捕，這時距離新課綱上路已

剩一個禮拜。參與者因無法得到教育部進一步的訴求，因而疲憊不堪，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做，後來林冠華的死亡，點燃了台灣民眾的情緒，夥伴的死亡也讓參與運動的學生們的情緒從沮喪轉為強烈的憤怒，他們不解，為什麼需要一個人的死才能換來社會的關注。



然而，在運動過後，帶給台灣社會什麼樣的改變？在下一章節中，將以「改造公眾意識」與「改造政策訴求」兩點來說明。

三、 社群主體到歷史主體

夏曉鶯（2006）認為以社會運動的主體性而言，移民的聲音是移民運動取得社會正當性的必要條件，移民透過社會運動來爭取修改不合理的法令，而這些社會行動者也會在參與運動的過程達到歷史主體。歷史行動就是行動者想突破自己所處的歷史質（Touraine，2000），社會運動就是以衝突的形式來尋求文化價值的重構。在本研究中，欲探討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過後，改變了台灣社會地哪些文化價值？

（一）、 改造政策訴求

2016 年總統與立委大選過後，執政黨由國民黨轉換為民進黨，在立院民進黨也過半數的情況下宣布通過撤回課綱，新上任的教育部長潘文忠也在新政府上台後宣布廢止爭議課綱⁶。距離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將近一年的時間，參與者

⁶ 教育部長潘文忠上任第二天，今天召開記者會，宣布將在近日內以行政命令廢止 103 年通過的社會、國文科微調課綱，但學校如果已完成選書程序，仍可使用新版本的教科書。教育部課程審議會 103 年 1 月表決通過高中課綱微調，部分內容引發爭議，例如「日本統治時期」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增加反共政策等背後原因，引起民主進步黨和部分民間團體不滿，接連舉辦抗議活動。民主進步黨於 5 月 20 日正式執政，教育部長潘文忠今天舉辦上任後第一場記者會宣布，103 年通過的微調課綱，程序不正義、參與研修人員代表性不足，將在最快時間內廢止微調課綱。教育部在書面報告中指出，雖廢止 103 微調課綱，但已完成 105 學年度上學期選書程序的學校，教育部會尊重學校的選書權，仍可使用一句 103 微調課綱編撰的教科書。但 105 學年度下學期之後，至 107 年十二年國教課綱接上來的過渡時期，則需使用 101 課綱版本。

(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5215002-1.aspx>)

紛紛在 facebook 上轉發新聞資訊，而參與者對新政府廢止課綱有兩種態度，一是認為訴求已經達成，但也有人認為這很難說是運動的效果，也許是新政府立場與國民黨不同，所以廢止也是新政府上台後可以預期的結果。

撤回，對啊這是我們的訴求啊，但好像沒有贏的感覺，不是我們而是換政府的關係，我們好像剛好搭上順風車，才達到我們的利益，這就是民進黨的立場啊，剛好立委也過半，就我們的影響太小了，但我不確定我們這樣做是否有影響立委投票，但好像就是時間到了，但好歹也是用一條生命去換的，就覺得很不值得。（受訪者阿正）

雖然有其他參與學生也有跟阿正類似的想法，但新政府廢止課綱仍然與運動相關。教育部長潘文忠在記者會上宣布廢止課綱的理由為：「程序不正義、參與研修人員代表性不足」。過去幾任的政府都有課綱程序的爭議，讓外界質疑政府按照符合其政黨色彩的意識形態來修改課綱，然而，新政府上台後，以程序正義為理由來廢止 104 課綱的施行，代表新政府拋棄過去的作法，肯定程序正義的價值觀。另外，新政府也通過了「高級中等教育法」修正案，在課綱審議的委員的組成方面，首次納入學生代表。參與學生認為，讓學生能自己發聲就是前進的第一步。

課審會有學生，算一個目標達成，最完美最烏托邦最高就是政治不要介入教育，但其實很困難，大家都希望自己可以做一點事可以影響社會，至少政治不要影響教育，因為教育很重要，但這目標太大了，所以課審會有學生，有撤掉算是有達成吧。課審會有學生算是第一步，但最終不要再用填鴨式的教育希望可以培養批判與判斷的能力。（受訪者小美）

不過，參與學生表示，他們雖然肯定新政府的表現，但他們認為課綱爭議是不分政治色彩，他們還是會持續監督新政府施政。

若他們還是跟現在的政府一樣，我們還是會再站出來。（受訪者文琪）



(二)、改造公眾意識

在陳憶寧《探索政治議題感知的世代差異——一個媒介效果的觀點》的研究中，探討了不同世代的媒介使用與政治議題感知的關係，她以 2008 年中研院的社會變遷調查為資料來源，發現網路新聞對於年輕世代的影響力大於傳統媒體，但其他世代就未見到網路使用時間、網路新聞依賴程度以及網路新聞可信度對於政治議題感的影響（陳憶寧，2010）。在三一八運動中，參與的年輕群眾對於特定媒體產生高度不信任感，除了拒訪，甚至出現在採訪車上塗鴉、貼便利貼等行為，足以顯現年輕世代對於新聞媒體產生了質疑。

本研究發現，在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中，參與學生藉由新媒體使用以及與傳統媒體的互動中，培養出質疑新聞報導的能力；更深化了他們的公民意識，讓他們發覺自己有力量去改變社會的不公義；而他們的參與，也影響了身邊的親友，改變親友的投票選擇，也讓親友更願意關心社會議題；然而運動成員的自殺，無疑是這場運動的噩耗，雖然促成台灣社會共同關心課綱議題，卻也帶給參與學生龐大的壓力。

1. 培養出質疑新聞報導的能力

曾接受過媒體採訪的參與者提到對於傳統媒體的看法，他們認為傳統媒體仍然是重要的傳播管道，他們平常也會看電視新聞，但在採訪過程中，有受訪者口誤，並當場要求更正，但事後仍播出錯誤的版本，扭曲了受訪者意涵，讓他們感到錯愕。也有在運動現場突然的採訪，參與者說當時她正在休息，一支麥克風突然遞到面前，記者便開始霹哩啪啦問問題，讓學生難以防備，說出沒有預期的話。參與者本身也成為一個媒體，透過個人、組織的社群平台來發聲，新聞媒體再跟著發表的內容進行報導，參與者與新聞媒體在主動與被動的角色中切換著。

我會更關注媒體識讀還有對自己的認同，因為曾被媒體斷章取義，你

講一二三，她寫一三或是一二，他們來訪談後跟寫出來的文章不一樣，我有反應過，是自由時報，那次有收斂一點。本來對新聞的信任感是七成，現在大概只剩三成，在自己去找資料。（受訪者阿豐）

會思考社運的行動策略與效果，會想到社會觀感，因為媒體還是會說學生是暴民，就有負面的感覺，對媒體的信任感降低，但這件事後，家人也會比較關心媒體的正確性。（受訪者阿德）

在高中的公民課程裡有媒體識讀的部分，而這次的參與者獲得資訊的管道主要並非是傳統媒介，他們對於網路科技的使用熟悉，因此，當他們在網路上看到與傳統媒體不同的意見時，會去多查一些資料，並思考哪個才是正確的。在運動過程中，他們是第一手的消息傳播者，他們了解事件的真實性，當錯誤的消息被媒體、網友轉出後，他們才發現，原來錯誤的訊息是這麼擴散出去，就算澄清了，還是有許多人選擇相信錯誤的報導。

除了公共電視，其他電視台要賺錢，媒體的素質不高，但這也不完全是媒體的問題，商業台沒辦法，要賺錢啊。比起叫電視台去改變，應該從教育著手，讓學生閱聽人願意去關心。當大眾的胃口改變，新聞也得改變，不然他們也賺不了錢。今天大家喜歡看腥羶色，所以他們繼續做，如果改變了，他們就少做，我覺得這是政府公權力可以做的，改變閱聽人胃口。媒體素養，之前就有想過，高中的媒體識讀會教，說閱聽人要會辨別對錯，教育者會說閱聽人是接收的主體，但我覺得閱聽人應該是一個可以去要求的，雙向的，閱聽人要什麼，媒體給什麼，不是全然媒體給，然後閱聽人去選擇辨別。（受訪者小花）

2. 透過新媒體突破傳統媒體的意識形態

在運動過程中，參與學生也認知到傳統主流媒體具有特定的立場。他們發現家裡平常選擇的傳統媒體，與家長的政治傾向有關；而有特定立場的媒體可能會選擇性報導他們的言論，像阿正就說：「斷章取義超級多，尤其是中國

（研究者註：傾中國）的媒體。」



課綱議題真的發現會被亂截，這真的有差，因為各大主流媒體的政治傾向，像 TVBS、八大就不會來找我跟阿正（採訪），他們會去找丙同學。（受訪者小花）

參與學生表示，幾乎所有的傳統主流媒體都報導過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消息，然而，他們發現在同一場活動中，不同媒體報導出來的內容與角度並不相同。在主流媒體上，報導雖多，看似能見度大，但參與學生認為，社會上不關心的人還是多數，報導後，並未引起大眾的關心。

剛開始很容易登上媒體版面，因為學生抗議很有焦點，所以媒體很愛報，但就沒了，其他學校也是，就無疾而終。（受訪者阿傑）

參與的學生表示，為了避免接收到單一的立場新聞，他們會透過新媒體查詢更多資料，當他們得知一個感興趣的議題時，會主動透過網路查詢更多相關訊息。

接收新聞的來源網路跟電視都有，但這些都是二手的啊，除非去當記者，不然都是第二手嗎，所以我會去查證，要有自己的立場也很重要，雖然很多事沒有對錯，但至少要能辨別真實性，只要看到自己有興趣的，我會去查還有沒有新聞之外的資訊，看看別的面向，最低限度就是不要只有單一源頭，要得到多一點面向，所以我現在很少看電視新聞，所以大多是在網路上看。（受訪者小美）

參與學生也會與家人分享不同新聞觀點，並提醒他們身邊的親友，平常選擇的傳統媒體可能具有特定立場，希望他們可以多看不同新聞媒體，才不會在無形中只接受單一意識形態。

記得好像是大選時，是我大一的時候，我就說妳（姐姐）可以不要看

中天嗎？我姐覺得這個新聞、這個節目是好的，我才開始跟她說為什麼中天不好。開始瞭解看的媒體要有能力去判別，雖然你會覺得看中天好像沒關係，但的確有影響，的確有傷害，這是無形的，所以為什麼不去挑選更好的媒體，所以至少我姐跟我媽都會被影響，因為他們都會看我臉書的文章。（受訪者小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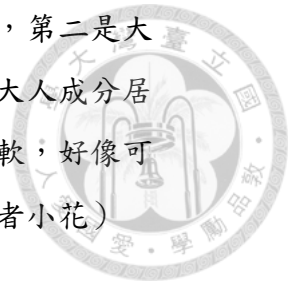
參與學生也會透過新媒體直接讓群眾看見他們的聲明，例如：運動成員在慰安婦議題上的口誤被媒體大肆報導，因而模糊了運動焦點，該成員選擇在個人臉書直接道歉說明，北高盟以及其他組織選擇直接轉發分享他的道歉聲明。參與者也會以直播的方式讓群眾看見運動現場的過程，或是透過粉絲專頁的發文進行現場情況的即時更新，像是現場物資需求，並以 google 表單方式公開讓群眾了解物資徵求的情況。這些參與學生選擇以新媒體進行自我發聲，突破傳統媒體的意識形態；他們意識到傳統媒體的特定立場，並提醒家人不要只接收單一的訊息來源，他們會與家人分享新媒體上不同的新聞觀點，新媒體讓他們擁有更多新聞的選擇。

3. 深化高中生的公民意識

8月6號，「北區反課綱高校聯盟」正式宣布退場，抗爭似乎告一段落，但在那之後，參與者仍以不同的方式在關心的社會議題。課綱議題啟發的並不只是課本的內容的爭議、統獨議題、國族認同、教育本質等等都在運動中受到討論。參與者透過運動，在不同的社會議題中，轉化主體，有人加入 NGO 組織、有人開始投入性別關懷的面向、也有人持續投身社會運動。最重要的是，他們意識到，學生也擁有很大的力量，高中職學生不再只是大人口中的幼苗、不再只是為了考試而活著的個體。

在過去的社會運動中，所謂的學生運動，大多指的是大學生，但從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開始，參與的學生發現社會運動的門檻並沒有那麼高，更意識到原來自己也很有力量。

高中生出來變成一件社會大眾沒那麼意外且可以接受的事，第二是大家對運動的距離沒那麼遠，三一八還是有一半讓大家覺得大人成分居多，但這次學運都是未成年，好像比較親近，氛圍比較柔軟，好像可以比較接近，未成年人也可以，不是大人主導的。（受訪者小花）



已有豐富社會運動經驗的阿貴則認為，在升學制度下，學生主體被壓抑，學生雖然有許多想法，卻不知道怎麼表達。無論這場運動在參與者眼中是否達成訴求，運動過後，台灣社會已經改變過去對於高中生只會念書的刻板印象。

這次運動中，我覺得學生們有顛覆我過去的想法，以前認為他們只會念書，這代表了社運的年輕化，也是對我們這些長期做運動的人的鼓勵。也是經過這次才發現，過去我們會收到一些批評，可是不知道來哪裡，現在才知道原來是一些比較老的世代。為什麼年輕化，我跟社運圈朋友的討論是不能只用學生準備考試就認為教育是失敗的，應該關注的是這個結構的變動。我想很多運動不只是對政府施壓，還有另一個目的是讓群眾討論。（受訪者阿貴）

這場運動後，我對青年世代有比較大的想像，我們也有力量，可以翻轉，這些參與過的學生回到校園後會不一樣。（受訪者阿土）

有參與者表示，以前覺得社會議題跟政治好像可以分開，課本裡面教導他們政府體制、選舉制度，卻沒有跟他們解釋何謂台灣主體性、為什麼改朝換代政策就大轉向，所以他們認為政治很複雜，離他們很遙遠。然而，深入關心課綱議題以及參與運動後，他們對政治有更多的理解，對時事議題表達自己的看法，也會參與講座，甚至為了支持的社會議題再度走上街頭。

我覺得這個社會並沒有轉變，還是一樣，上面藍綠互罵，下面小確幸，但我的視野變廣了，以前雖然關心社會議題，但不了解很多，像是以前我以為台獨就是中華民國，但其實並不然。以前我也會覺得賺很多錢就可以改變一些事，但真正參與運動，關注的事越多，就會發現賺

很多錢跟改變社會是兩回事。運動也影響了我指考的選擇，以前我念三類，但後來對一類有興趣。我身邊的親友並沒有改變，但我的交友圈完全不一樣，現在幾乎沒有和高中的同學聯絡，以前我的話題是等一下節目播什麼，但現在就會討論政治。（受訪者阿明）



我從國中到高一都是淺藍，但從大埔、洪仲丘再到 318、有一種被啟蒙的感覺，所以才會實際參與反黑箱課綱運動，是很大的改變，以前只會在 PTT 裡回文發文，到參與後，有組織經驗，政治關懷被改變，對台灣的認同更多，讀更多有關台灣主體性的書。（受訪者阿傑）

這場運動除了培養這些參與的學生的公民意識，也讓他們身邊的人願意更關心社會議題。像小美就看見她的朋友圈因為她的參與而更願意關心社會，也更願意在公開平台上發表個人意見。

社會一定有改變。可能一年前問我，我可能會說這一場是屁，什麼都沒有達成。但現在去看，至少年輕的一輩，我自己在看朋友的臉書，更多開始關心社會議題，也有大我十幾歲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他們也關心很多議題，雖然面向可能不同。發現大家在臉書上會談論議題，氛圍會改變。社會議題真的很複雜，有時候相信說是對的，但真的是對的嗎？要相信什麼？什麼是對的？培養更多能力吧至少不要讓自己變成人家口中說的為了反而反，要學習更多，因為有時候太深入社運會迷思自己，像所謂的同溫層，反課綱時就是這樣。所以想跳脫同溫層，學到更多不同面向思考的方式，一個社會議題沒有絕對對錯，像當時反課綱，我們站的位置也未必絕對是對的，會去想有沒有更好的方式，或其他努力的方式。（受訪者小美）

參與者在求學過程中，都感受到教育體制的壓迫，參加運動後，他們開始對教育內容產生更多興趣，像阿土就在大學期間選修台灣史課程，小美也選修了教育學程，阿水加入了關心社會議題的大學社團，阿正則是參加體制外的教育營隊。他們也在學習透過不同於社會抗爭的方式成長。



想去了解那個時代的人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跟作為，歷史教育一個很重要的去是了解當時脈絡下的事，以前只是單向接收，但現在會去想為什麼，當時的歷史脈絡中，那些人在想什麼，應該如何溝通，怎麼去批判，不能講什麼就相信，像是白色恐怖 20 年的時間，也有人左派路線，有人是台獨，為何有這樣的差別，可以回到那時候的脈絡去檢討，但現在卻是線性的思考講述的，課綱應該要去解決歷史教育的想像。（受訪者阿水）

（討論）成立一個體制外教育的 NGO，就沒那麼激烈，正在討論，快成立了，為體制外教育做努力，有點像蒙特梭利，但不是，是互動，全人教育，不管是親子共學或創造教師沒有特定身分，持續辦營隊，希望朝互相討論、自主學習，以學習者為主體等，實際的營運還在討論，覺得自己可以試試看，換一種方式（關心教育內容）。（受訪者阿正）

4. 改變家人政治取向 關注候選人政策

在運動期間，參與者身邊的親友無論支持與否，都會因為他們的參與，而去了解課綱議題，在運動結束後，參與者常常會在 facebook 上發表意見。課綱議題結束後，緊接著是總統與立委選舉的到來。參與學生在培養了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度後，也會思考政治參與。受訪者中年齡都未滿 20 歲，雖然他們沒有投票權，對社會議題卻很有想法，會跟家人討論，甚至影響了家人的投票選擇。

今年的總統立委大選時，我們家是泛藍，我還記得我姐 20 歲了有投票權，但她居然沒有投給兩大黨，而是投給綠社盟，我媽跟我爸都是，全家政黨票居然都投綠社盟，我超驚訝，而且我媽之前都不會回去投票，今年還特別跑回新竹投票。（受訪者小美）

記得好像是大選時，我就說妳可以不要看中天嗎？但我姐覺得這個節目是好的，我才開始跟她說為什麼中天不好，.....我跟她說很多事

情無形中會影響到他人，妳雖然不關心，但很多事情在社會發生，有人正在被傷害，你是有能力的但妳的漠不關心有人可能會因此被傷害，所以姊姊後來也慢慢關心社會議題，會討論。開始瞭解看的媒體要有能力去判別，.....所以至少我姐跟我媽都會被影響，因為她們都會看我臉書的文章，我有另外一個帳號，我有其他想表達的論點，我姐姐看的到，所以她會覺得的確好像該做些什麼事。（受訪者小美）

5. 促成社會共同關心課綱議題

礙於學生時間與人力和資源有限，以及組織經驗的不足，受訪者到了六月份都感覺到，媒體曝光雖然增加，但在距離達到訴求還非常遙遠，成效似乎有限。不關心的學生還是不會主動關心，保守立場堅定的老師也難以說服，這時他們遭遇到行動的停滯期。參與者從一開始的熱血沸騰，到了七月份感到疲憊，他們說似乎在打著一場沒有盡頭的戰。面對八月一日新版課綱正式上路，前教育部長吳思華還是沒有進一步的回應，除了譴責參與者的行為，甚至要對參與者提告⁷，參與者無不感到龐大的壓力。

北高盟的核心成員林冠華曾對其他成員預告過自己會在生日當天自殺，為運動製造空間，當時成員半信半疑，但仍給予許多陪伴，也試圖告訴他的親友，希望多關心他。7月30日的凌晨，林冠華在自己臉書上寫著「祝我生日快樂」，「部長，把課綱退回吧。」這兩行字，早上便被家人發現他已燒炭身亡。

大林自殺這件事其實不會讓我無所適從，會找事做。那時我就會想，NGO告訴我什麼，一方面整理自己的情緒，大家會覺得更有義務要做得更好。我們是參加這個運動才認識，但組織裡我跟他最好，自殺是他製造的空間，我們就要利用並做到最好。他其實一直有暗示要自殺，我有想過，但想說應該不會發生吧。事後覺得很累，也有責任，也蠻自

⁷ 反課綱行動延燒，23日晚間數十名學生闖入教育部長辦公室，今日凌晨遭警方逮捕，而稍早教育部召開記者會，教育部長吳思華表示，遺憾少數學生惡意闖入公署，已違反脫序、公然犯罪行為，對社會做出錯誤示範，將依法對同學訴諸法律途徑。
(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389469>)

責的，但沒有過度悲傷，因為那是他的選擇。我也有勸過他，但他既然都暗示我們要利用他的死亡，這個運動對我們來說就更加重要。(受訪者文琪)



運動參與者的死亡，在台灣社會投下震撼彈。參與運動的學生認為，在林冠華死前，台灣社會並沒有那麼關心課綱議題，因為一個人的死亡，而引發大眾的關注，並非他們希望的方式。受訪者阿傑也觀察到「因為大林的死，更多人像是政黨人物、學者與學生站出來。」

當時以課綱的議題雖然蠻大的，但不是很受到社會關注，真正受到關注是因為一個同學的死才散播到整個台灣。當天晚上我們聚在平常開會的地方，才聽說有外面的人在教育部聚集，所以我們才去教育部，當時衝進去也是個沒想到的事，也是因為群眾很多，也沒有要號召，所以蠻可笑的，我們之前那麼努力號召，人都不多，但當天晚上人超多，應該一千多人吧。(受訪者小美)

這個噩耗對每天相處的運動夥伴來說，更是無比沉重。參與者不希望消費林冠華的死亡，而面對新聞媒體揣測、八卦式的報導，他們感到無比憤怒，但他們也無法幫當事人解釋，因為連他們都搞不清楚，他到底為什麼下了這個決定。

我想放棄，但這個放棄不是單純不幹了，而是這件事沒有重要到拿命去換，在我心中是這樣的感覺，說真的這樣蠻不適合當領導者，怎麼想都是性命比這件事重要啊，在我心中是蠻明確的，而且其實那時候我想停止，但我說不出來，因為也不可能。因為自殺而沸騰我就很不舒服，對這個現象不舒服，而不是人的意圖，一定是越多媒體報越多人知道，邏輯上沒錯，但心裡就是不舒服，一定等人死掉嗎。(受訪者阿正)

在運動過後，從「改造政策訴求」與「改造公眾意識」兩個面向上，都可

以發現台灣歷史質的轉變。除了政府行政落實程序正義，參與的學生也從運動中實踐了公民參與的方式，更實質影響了家人的投票行為。而參與者也從運動中看到社會殘酷的面貌，脫離高中身份的民眾認為課綱調整不會影響到自己，因此無論學生如何進行抗爭、媒體怎麼報導，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一直無法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直到一名社會運動參與者的死亡，才引起社會譁然。

而這場運動最重要的是，改變了一直以來學生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學生本身也會肯定自己的力量，也讓人期待未來有更多學生的成為關心公共議題的主體。

第陸章、 結論

一、 高中生倫理主體的展現

2010年台南女中全校學生在升旗典禮發起脫褲行動，抗議生輔組長對服裝儀容的嚴格規定，到2016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候選人廣告以女高中生脫下裙子，爭取自由權利為題材，都可以見到高中生主體性的展現，然而社會大眾還是忽視他們的主體性，認為學生應該好好唸書，考上大學以後再來談論自己的看法。

在個人主體的部分，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的參與者過去大多屬於台灣社會刻板印象的學生，乖乖念書、考取好大學，然而在受教育過程中，他們的主體經常是受到壓抑的。當課綱議題發生後，學生從學校得知課綱調整的爭議，並透過網路找尋更多資訊；這些學生想突破社會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展現自我的主體性；而此次課綱涉及國族認同層面的爭議，對「天然獨」的世代來說，「去台灣化」讓他們難以忍受；想參與運動的學生與偏藍家庭中的政治立場開始衝突，他們發現自己過去有好感的政黨，卻正在黑箱的方式進行課綱的調整；而來自偏綠家庭的參與者則基於對社會議題的敏感度，讓他們更加深刻感受到社會不公義正在發生，而增加自己投入運動的動機；最後，他們焦慮感的最大來源則是課綱議題與自己切身相關。

而這些參與者解決焦慮的方式，便是採取社會抗爭，他們多被前一年發生的三一八運動所影響，許多參與者對於社會議題的認知是從那時開始，因此他們認為透過社會運動，將可以達到他們反黑箱課綱微調的訴求；另外，屬於網路原民世代的他們，選擇以 facebook 進行個人情緒的抒發，並尋找其他的運動夥伴。

Castells (2015) 認為在新媒體社運中具備的兩項要素：情緒與新媒體科技，而這兩個要素正是此次運動的關鍵。新媒體也是打造個人倫理主體的方式，一群對課綱議題感到焦慮的學生，再加上他們對於新媒體的應用十分嫻熟，網路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在社群網路的快速連結下，透過線上互相串連合作，從學校組織再到地方連結，形成更大的力量，最後轉移到台北，將議題上升到全國能見度；而他們也使用 facebook 直接發布新聞稿與聲明，學習如何自我發聲；另外，他們認為學校應該是學習的場所，要讓他們了解課綱議題，就算學校反對，也無法阻止他們參與。

這些參與的學生在運動後期，更依循著三一八運動的模式，採取占領政府機關的做法。然而，這樣的占領行動也引起參與學生不同的思考，激烈的行動是否符合學生的身份？涉及違法的事宜該怎麼面對？

這些參與運動的學生希望自己成為怎樣的的存在？他們認為既然課綱是有爭議的，為什麼教育者還是執意要推行？而參與學生認為既然是受教育的主體，就應該聽聽他們的聲音，不再被社會忽視；另外他們希望自己能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台灣已經有太多黑箱的情況產生，他們希望在民主法治的國家中，程序正義能被落實。

二、 社會運動素人也可以營造社群認同

此次參與運動的學生缺乏組織社會運動的經驗，然而，他們還是可以透過新媒體工具以及個體的主體性集結為組織。在組織的串聯上，此次運動的參與者透過線上分享合作與線下參與互動，來進行串連，組織之間互相共享資料，

也會在網路上分享彼此的活動，讓議題能見度擴大，也透過實際舉辦的活動接觸更多群眾。

然而，運動過程中，他們的主體性是被外界質疑的，家人與社會大眾認為他們是被政黨利用，受到蒙騙，因此，他們與政黨、利益團體保持距離，會向其他的資深社運團體借用物資，也會請教他們關於法律等專業的建議，保持友好但不合作；參與者深刻意識到他們的學生身份，因此，他們希望走出與過去社運不同的路，不要受到政治力量的干擾。

參與者也解決組織內部與外部的衝突，在組織中以民主的投票，尊重個體的差異，也學習多數決；當他們面對來自組織外部的批評，他們虛心接納。這些參與者在維持自主性與溝通妥協後營造出社群認同，因而產生社群主體性。

三、以社會運動改造台灣文化價值

Touraine (2000) 認為社會運動都具有民主的期待，讓那些沒有聲音者發聲，而 Castells (2015) 也同樣認為新媒體社運可以帶來民主，他表示如何去判斷運動的價值，並非透過運動訴求是否達成，而是觀看當時的社會與個人是否因此而改變。在這場運動中，參與者成功使得新政府落實程序正義，也促成學生進入課綱審議的程序，讓學生可以直接參與課綱的制定。

而在公眾意識的轉變上，參與者對於新媒體使用與傳統新聞媒體的互動中產生反思，由於曾經被媒體曲解的經驗，他們對於傳統媒體新聞信任度大打折扣，培養出質疑新聞與查證消息的能力；也進而發現傳統新聞媒體可能具有特定的報導立場與框架，然而，他們可以透過新媒體突破傳統新聞媒體的意識形態。而參與者在過程中，成為更願意關心社會議題的人，深化了他們的公民意識，也在大選中改變身邊的親友的政治立場。

在王維菁〈網際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以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為例〉的研究中，發現網路難以翻轉既有社會權力結構，但仍會造成挑戰與威脅（王維菁、馬綺韓、陳釗璋，2013）。運動中，也有相似的結果，運動進行的困難與壓力，

他們無法兼顧家庭、學校，參與者也表示學校中真的願意關心課綱議題的是少數人，社會也對他們投以質疑的眼光，扣上政黨色彩的帽子。

雖然無法翻轉既有的社會結構，運動也不盡然達到每個行動者的目標，但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場由高中職學生主導的抗爭，象徵著學生主體力量的展現，這些學生用他們的行動在台灣街頭上了一課，打破傳統教育中只有好成績與壞成績的刻板印象。

四、 Touraine 的行動者主體三面向架構化

反黑箱課綱微調運動中的主要參與者都是未滿 20 歲的青年學生，Touraine 的行動者主體化理論則是他觀察成人社會運動所得到的，因此，這是本研究中突破的地方，但也可能是受限的部分。由於參與者的政治關懷、公民意識都還在培養的階段，因此他們在主體的轉化過程會是劇烈且承受高度壓力的。參與學生因沒有組織社會運動的經驗，當他們投入運動後，才發現社會抗爭跟他們想像的不一樣，並非上街頭喊喊口號就可以達到訴求。回溯過去許多的社會抗爭，可能在短時間內看不到成效，要經過長時間才能轉變社會氛圍或是改變政策。參與學生在短時間內面臨家庭、社會的龐大壓力，甚至還要學習如何面對一位運動夥伴的輕生選擇。

在許多社會運動的研究中，運動者的主體性經常被忽略，未正視他們在行動中的改變與自主性（夏曉鵬，2006）。而本研究對象是高中職學生，他們在台灣社會中受到許多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好好讀書就好、考上好大學才重要。透過這次運動，他們扭轉了刻板形象。台灣的學生雖然受到許多教育體制的壓迫，但他們也有改變的力量。

在 Touraine 的行動者主體中已點出個人、社群與歷史主體的轉化，但他並未清楚區分主體轉化的元素，因此，本研究援引 Foucault 的「倫理主體」來做為個人主體化的分析。

在社群主體的部份，則是分為三個面向，Clay Shirky 與 Castells 對於新媒體

社運都有深入的觀察，在「組織串連」的面向上以 Clay Shirky (2011) 網路組織動員做詮釋，指的是新媒體社運的參與者如何透過線上的分享、合作進行集體行動。在「組織自主性」的部份，則是援引 Castells 對於個體自主性到群體自主性的分析 (林靜伶, 2014)。「組織的認同」則是以夏曉鵬研究來說明，社群主體來自對社群的認同，而社群感建立在組織內部的衝突與溝通上。

最後，在歷史主體的分析中，Castells (2015) 認為社會運動就是達成民主的方式，本研究以夏曉鵬 (2006) 移民運動的例子中達成歷史主體的兩個面向來分析，即「改造政府作為」與「改造公眾意識」。

五、 研究限制與建議

而在限制的部分，則有兩塊，第一是本研究主要訪談的對象為北高盟的五名決策者，以及非北高盟的其他六名參與者，然而因地區與時間的關係，無法將研究對象擴及全台灣，受訪者還是集中在北部地區，組織數量並不多，因此可能有研究上缺漏的部分。

另外的限制是，本研究中的參與者都提到運動帶給他們的傷害與壓力，然而，因本研究主題為學生的主體轉化，無法給予參與者的運動傷害太多篇幅描述，因此無法在本研究中妥善處理這個面向，以下給予一些補充說明。

首先，運動帶給參與者的壓力是運動過程與他們想像的差異很大，社會改革不如他們想像得容易，過程中有許多的衝擊和壓力，也許是他們這輩子都未曾經歷過的。

另外，在網路上，使用者的任何言行舉動都很容易搜尋到，新聞媒體與網友輕易就可以找到參與者個人的社群平台，有網友因不認同某些參與者的言論，而到他的社群頁面留言謾罵，甚至是在私人訊息中威脅，而最後他們甚至永遠失去了一位夥伴。每位參與者都坦言，他們有運動傷害，這些壓力對還在學習怎麼面對世界的他們來說是非常沉重的。

矛盾的是，質疑學生主體性的聲音認為，說這些學生太年輕，沒有足夠判別是非的能力，所以容易被政黨與有心人士利用，他們希望學生是被保護的，大人說不會給學生不好的東西，教改是對學生好的，課綱修改同樣也是。然而在運動過程中，外界給予的無情批評與嘲笑，又不把他們當作青少年來看待。

雖然這場運動帶給參與學生許多壓力，但不可否認，他們從中實踐公民參與，也學習到如何進行社會改革。更重要的是，在這場運動後，政府除了廢止爭議課綱，肯定程序正義的價值，還成立了課綱審議委員會，在這之中納入學生代表，像小美就認為這個做法能夠從學生角度出發看待課綱，讓學生實質上有參與課綱審定的機會，已經比過去進步許多。而學生也更願意關心自己的權益，甚至發表對社會議題的看法。也期待在這場運動後，扭轉社會對於學生的刻板印象，給予他們更多表達的權利，以及成長的空間。

對於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是，建立 Touraine「行動者主體」三層次的分析架構為研究者嘗試性的作法，而此分析架構恰好可以詮釋反課綱微調運動，然而，在蔡秀芬（2013）的研究中，以「賦權」（empower）的概念來詮釋中國新媒體帶來的歷史主體化，這是本研究未處理的部份，也許在未來相關研究可以補充公民賦權的概念。

參考資料：

Manuel Castells. (2015)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 in the internet age*.UK: polity press.

Touraine, A. (2000) *Can We Live Together?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王維菁、馬綺韓、陳釗璋（2013）。〈網際網路時代的社會運動：以台灣環境運動組織為例〉，《資訊社會研究》，25：1-22。

吳俊瑩、吳密察、李筱峰、周婉窈、金仕起、祝平一、陳翠蓮、黃維勻、蔡

- 蔚群、薛化元（2015）。《我們為什麼反對課綱微調》。臺北市：玉山社。
- 李宇美譯（2011）。《鄉民都來了一無組織的組織力量》，臺北市：貓頭鷹。
（原書 Clay Shirky.[2008].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 李映昕（2015）。《從 Foucault 倫理主體理論詮釋 318 運動期間台大新聞 E 論壇參與者的新聞實踐》。台灣大學新聞所碩士論文，臺北市。
- 林怡廷（2015-08-04）。《那些「自己課綱自己救」的高中生》。端傳媒。
（上網日期：2015.12.20）
- 林怡廷（2015-08-12）。《反黑箱課綱的暑假（中）——這一堂叫政治》。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12-taiwan-classreview/>（上網日期：2015.12.20）
- 林揚軼（2015-08-12）。《反黑箱課綱的暑假（下）——社運的滋味》。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12-taiwan-classreview3/>（上網日期：2015.12.20）
- 林靜伶（2014）。〈網路時代社運行動者的界定與語藝選擇〉，《中華傳播學刊·第二十六期》。網址：<http://cjc.nccu.edu.tw/word/22121212015.pdf>（上網日期：2015.12.20）
- 林鶴玲，鄭陸霖（2001）。《台灣社會運動網路經驗初探：一個探索性的分析》
<http://140.109.196.10/cil/social%20movement%20explore.pdf>（上網日期：2015.12.20）
- 洪貞玲（2015）。〈化憤怒為希望：反服貿運動中新媒體實踐及意義〉，《我是公民也是媒體》。臺北市：大塊文化。
- 胡元輝（2015）。〈打造社位傳播公地的關鍵報告〉，《我是公民也是媒體》。臺北市：大塊文化。
- 夏曉娟（2006）。〈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差異政治、主體化與社會性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61），1-71。
- 馬祥祐（2003）。〈村民自治——大陸社會力的重聲〉。《展望與探索》，1（5）。
- 張彥南（2007）。《傅柯晚期論主體與自我技術》。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市。
- 張錦華（2015）。〈從太陽花運動談新媒體、新公民、新民主〉，《我是公民也是媒體》。臺北市：大塊文化。

陳順孝（2015）。〈網路公民行動的集體演化：從搶救樂生院、野草莓到太陽花運動〉，《我是公民也是媒體》。臺北市：大塊文化。

陳憶寧（2010）。《探索政治議題感知的世代差異——一個媒介效果的觀點》

陳蕾（2014）。〈科技賦權下的社會運動：以社群網站中「洪仲丘事件」公民參與為例〉，《2014 創新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曾韻潔（2014）。〈從參與到合作：以「樂山飲」與「母親的布」創作計畫為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碩士論文，臺北市。

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2002）。〈行動者的歸來〉，台北：麥田。（原書 Touraine, A. [1984]. *Le Retour de l'acteur: essai de sociologie*. Paris, France: Librairie Artheme Fayard.）

維基百科，Facebook。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上網日期:2015.12.30）

維基百科，臺灣高中課程綱要微調案。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9%AB%98%E4%B8%AD%E8%AA%B2%E7%A8%8B%E7%B6%B1%E8%A6%81%E5%BE%AE%E8%AA%BF%E6%A1%88#.E5.85.A7.E5.AE.B9.E7.88.AD.E8.AD.B0>（上網日期：2016.02.05）

蔡秀芬（2013）〈祛魅、啟蒙與賦權：中國新媒體作為另類傳播的行動與影響探析〉，《新聞學研究》，116：127-172。

蔡榮峰（2015）。《鍵盤參戰—淺談「數位原民」的網路政治學》
<http://whogovernstw.org/2015/08/29/jungfengtsai6/>（上網日期：2015.12.20）

蔣金（2015-08-12）。〈3分鐘看50年：歷史課綱的歷史〉。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12-taiwan-classreview4/>（上網日期：2015.12.20）

鄭宇君（2008）。《新聞專業中的真實性：一種倫理主體的探究模式》。政治大學博士論文，臺北市。

蕭遠（2011）。〈網際網路如何影響社會運動中的動員結構與組織型態？—以台北野草莓學運為個案研究〉，《台灣民主季刊》，8（3）：45-85。

附件一



反黑箱課綱運動大事紀

時間	事件
2015.05.01	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學生發起反黑箱課綱靜坐活動
05.06	教育部發函至全國高中，要求選用新版課綱。國教院發文出版社要求未來不得再售舊版課綱
05 月底	全台出現百餘個由高中生所發起的反黑箱課綱臉書粉絲專頁
06.01	教育部長吳思華提出新舊課綱併行、新舊差異不列入大考範圍
06.02	北區反黑箱課綱高校聯盟成立
06.09	教育部至台中一中開座談會，遭多名學生抗議
06.12	教育部取消 13、14 日至台南一中、師大附中、新竹高中的座談會
06.13	北高盟到教育部抗議座談會取消，南部高中五百人聯署抗議
06.15	北高盟發起第八節突襲，在多個學校門口宣傳 吳思華回應課綱問題
06.24	游騰傑進入教育部潑漆抗議遭警方逮補
07.05	北高盟、北職盟、桃區聯盟、蘋果樹公社等高中共四百多人由國教屬遊行至教育部抗議
07.13	40 多名學生至國教署抗議，並拉開鐵門入內靜坐
07.22	北高盟發起「722 包圍教育部活動」，百名學生夜宿教育部 教育部回應將再舉辦四場講座
07.23	20 名學生進入教育部，部分學生與記者進入部長辦公室，遭警方逮補
07.24	吳思華表示將對示威學生提告
07.30	北高盟聯盟發言人莊敬高職學生林冠華燒炭自殺 反黑箱課綱學生至教育部與立法院示威
07.31	示威活動未獲教育部回應，學生升級行動，群眾推倒拒馬進入教育部，教育部內外聚集約五百名群眾

	教育部主秘王俊權、次長林思伶、吳思華現身回應。台北市長柯文哲亦到教育部要求學生理性和平，呼籲教育部做出回應。立法院召開臨時會處理課綱爭議，最後朝野協商破局
08.01	於台北市濟南路舉辦林冠華追思會，逾三百人到場參與 吳思華撤告
08.03	吳思華與反黑箱課綱師生會面，談判沒有結果
08.04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到教育部關心現場反黑箱課綱學生
08.05	立法院建議教育部進行課綱檢討 北高盟代表朱震、王品蓁、梁艷柔發表聯合退場聲明
08.06	反黑箱課綱學生團體聯合發表聲明，宣布退場，撤離教育部
2016.04.29	立法院表決通過，要求教育部撤回課綱
2016.05.21	教育部長潘文忠發出聲明，宣布停止微調課綱版本



王怡蓁製表

參考資料：端傳媒蔣金（2015-08-12）。〈3分鐘看50年：歷史課綱的歷史〉

附件二 受訪者列表

代號	身份	組織	性別	是否有參與社會運動經驗	訪談地點
文琪	A 高中生	北高盟成員兼 A 高中組織成員	女	是	咖啡店(1hr) 2016/01/23
阿明	B 高中畢業生	北高盟成員	男	是	咖啡店(1hr) 2016/01/23
阿傑	C 高中畢業生	C 高中組織成員	男	否	咖啡店(1.5hr) 2016/01/23
阿貴	D 大學生	中途退出地區組織但仍參與運動	男	是	咖啡店(1.5hr) 2016/01/23
阿豐	E 高中生	E 高中組織成員	男	否	便利商店 (1hr)

					2016/01/24
阿德	E 高中生	E 高中組織成員	男	否	便利商店 (1hr) 2016/01/24
阿水	F 大學生	高中組織成員	男	否	鬆餅(1hr) 2016/01/18
阿土	G 大學生	高中組織成員	男	否	鬆餅店(1hr) 2016/01/18
小美	H 大學生	北高盟成員兼高中組織成員	女	是	咖啡店(2.5hr) 2016/12/13
阿正	I 大學生	北高盟成員	男	否	咖啡店(1.5hr) 2016/12/14
小花	J 大學生	北高盟成員兼高中組織成員	女	否	咖啡店(2hr) 2016/12/17

附件三

訪談大綱



個人主體

1. 如何得知課綱議題？
2. 平常如何關心社會議題？透過哪些方式？
3. 在學生身份上，你感受到反黑箱課綱微調的衝突與焦慮為何？
4. 說明參與運動的動機？
5. 過去是否曾有參與運動的經驗？
6. 在加入組織前做了哪些事？

社群主體

1. 請描述自己參與運動的過程，做了哪些行動？
2. 為什麼選擇以臉書進行串連？如何經營臉書粉絲專頁？
3. 希望透過抗爭達到什麼目的？
4. 在過程中，所屬組織進行哪些策略？
5. 在互動過程中，如何與群體進行合作？遇到不同聲音，如何因應？認同自己的組織嗎？

歷史主體

1. 你認為這次運動對自我、親友與社會造成哪些改變？
2. 對於政府撤回課綱的看法？
3. 未來如何繼續關心社會？